

## 書寫與塑造：1949年後「五四」 政治話語及政治形象在大陸的確立： 以「胡適思想批判」運動為中心的討論\*

尤小立\*\*

「五四」的政治話語和政治形象雖然是在1949年後，才逐漸開始為中國大陸的人們所接受，但其源頭可以追溯到1919年「五四」後左翼知識分子對「五四」以及新文化運動的詮釋和定位，這一定位和詮釋也間接或直接地影響了毛澤東。隨著1930年代末、40年代初毛澤東將「五四」作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端」，「五四」政治化的傾向開始確立。自此以後，在中共和左翼知識分子的話語中，「五四事件」的地位上升，成為中共歷史合法性的基礎之一；而新文化運動則逐漸消隱，最終被同化在「五四」的敘事之中。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經過不斷的政治運動和思想改造運動的正面宣傳和反向強化，特別是1954-1955年間的「胡適思想批判」運動，不僅將胡適排除在五四新文化運動領袖譜系之外，代之以政治領域的李大釗、毛澤東和文化領域的魯迅，而且全盤地消解了與新文化運動相關的科學、民主、個人主

---

\* 承蒙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四位匿名審查委員的認真審閱及諸多建設性意見，彌補了拙文的不足，亦為拙文增色良多。現已遵提示一一增訂修改，特此申謝。

\*\* 蘇州大學哲學系副教授，復旦大學中外現代化進程研究中心、歷史學系博士候選人。  
聯絡方式：215123江蘇省蘇州市蘇州工業園區仁愛路188號蘇州大學哲學系(No. 188, Renai Rd., Suzhou Industrial Park, Suzhou City, Jiangsu Province 215123, China)。

義、實用(驗)主義和世界主義等核心要素。五四新文化運動政治概念化和意識形態化的影響在中國大陸一直延續至今。

關鍵詞：五四運動、新民主主義革命、胡適、毛澤東、個人主義、  
世界主義

## 一、前言

1939年12月，毛澤東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中，首次明確提出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概念。1940年1月9日，他又在陝甘寧邊區文化協會第一次代表大會上作題為〈新民主主義的政治與新民主主義的文化〉（後改為〈新民主主義論〉）的講演，將「五四」學生運動定位成「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端」，從此以後，中共關於「五四」學生運動的評價便日益地政治化。在此之前，左翼知識分子對五四的認知尚有學術的成分，<sup>1</sup>思想層面的意義強調得比較多，但1940年代以後，這樣的論述明顯減少，至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政治日益籠罩社會，「政治掛帥」成了社會生活的常態，「五四」的意識形態化不僅是必然，而且成為中共合法性的歷史依據。

問題是，這種政治話語是怎樣出現，進而確定的？又是怎麼逐漸通過政治運動或思想改造運動反向地強化，並通過知識分子之間相互批判得到輔助性地強化？<sup>2</sup>最終怎麼塑造出為人們所熟知的「五四」的政治形象？

本文從毛澤東對「五四」的重新定義以及「五四」新意涵的形成開始論述，是因為隨著毛澤東在中共黨內領袖地位的確立，這個新定義遂成政治化「五四」的權威標準，後來的書寫和塑造過程都以此為準繩。當然，「五四」的政治化過程，並非自毛澤東始，而是1919年「五四」學生運動後，左翼知識分子以及中共黨內理論家共謀(Collusion)的結果。但「五四」的政

---

<sup>1</sup> 為簡化敘述，節省篇幅，拙文一般以不加引號的五四來稱謂廣義的五四新文化運動（即五四運動），以加引號的「五四」來稱謂狹義的「五四」學生運動或「五四事件」。另外，文中使用的「知識分子」一詞，為與歷史本身和引文相協調，取最普通、最寬泛之義，也即1949年後中國大陸歷次政治運動或「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中約定俗成的有一定文化水準，又從事教育和文化工作的「讀書人」，並非法國起源的intellectual或俄國起源的intelligentsia，但英文摘要，恕仍使用「intellectual」。

<sup>2</sup> 拙文「輔助性地強化」意指兩種情況：一種是胡適以前的學生為求自保而不斷加碼地批判胡適，並最終接受了「五四」的政治話語（如陸侃如）；另一種是知識分子在批判胡適的過程中相互地批評，從而推動了「五四」政治形象塑造的進程。這中間以左派知識分子為主。總體看，這一切主要出於政治運動的挾持，當以同情的理解；但各人的選擇和表現不同，那些過分地迎合者，或不能歸因於外在的壓力。

治形象和政治話語的建構也並非全是正向的，到 1949 年 10 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它基本上是通過反向的強化，即通過政治批判運動或思想改造運動迫使舊知識分子認同「五四」的新意涵和新「歷史」。1954 年 12 月至 1955 年 3 月的「胡適思想批判」運動不僅在中共對知識分子進行的歷次思想改造運動中具有代表性，而且最為集中地展現出思想批判運動對政治化「五四」反向強化的所有特徵，「五四」政治形象的塑造也在此次運動後得以完成。此次運動的重點自然是批判胡適思想，但鑒於胡適在民國知識界的巨大影響力，否定胡適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領袖地位和治學方法便成了政治化「五四」建構不可或缺的環節。胡適的「政治反動性」在 1947 年已經確定，到 1949 年後舊知識分子也只能在非此即彼的政治遊戲中作單向選擇。其中有兩類情況，特別值得注意。一類是與胡適關係密切的舊知識分子，他們需要通過自我檢討、自我批判或者對胡適反戈一擊來完成脫胎換骨式的「自我救贖」，結果，從最初的不情願到最後的相信，以致產生了「假作真時真亦假」的幻象。另一類是政治運動下比較隱晦的現象，即原本學術路向不同的學者借助政治運動發泄內心的不滿或打擊學術上的異己，這是本文所謂「政治掩飾下的學術分歧」，圍繞著胡適的治學方法(考據學方法)的爭議即屬此例。然而，在政治的裹挾之下，這一切都被匯入到意識形態化的「五四」政治形象及政治話語建構之中，成為輔助力量或輔助因素。而借助批判胡適思想，與胡適有關，且為五四思想的核心要素也一並被批判性地消解。為完整展示書寫和塑造整個過程，本文亦對相關概念的源流、背景進行了簡要的回溯、梳理和解析。

## 二、毛澤東對「五四」的重新定義和「五四」新意涵的形成

「五四」學生運動本身就是一場政治運動。然而，在「五四」以後的二十年間，左翼知識分子對「五四」的詮釋，基本是將政治層面與思想文化層面混為一體的。<sup>3</sup>這是因為，在對於「五四」本身的理解上，他們主要

<sup>3</sup> 胡適晚年頗不信任後人關於五四的回憶和詮釋，他 1961 年 12 月 28 日說：「人家寫『五

還是取廣義的五四，即把 1915 年 9 月《青年雜誌》（《新青年》）創刊以後開始的新文化運動與 1919 年 5 月 4 日開始的「五四」學生運動合併起來看待。二者的關聯，在他們看來，不僅緊密，而且是相互促進的。這個傾向在中共內部和左翼知識分子中間的實質性改變從 1939 年 12 月毛澤東〈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一文發表開始。

### （一）「五四」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端」

在〈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中，毛澤東說：

現時中國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革命，已不是舊式的一般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革命，這種革命已經過時了，而是新式的特殊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革命。這種革命正在中國與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發展起來，我們稱這種革命為新民主主義的革命。這種新民主主義的革命是世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一部分，他是堅決地反對帝國主義即國際資本主義的。……這個過程是從第一次世界大戰與俄國十月革命之後才發生的，在中國則是從 1919 年五四運動開始的。<sup>4</sup>

將「五四」學生運動定位成「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端」，這也意味著，新文化運動與「五四」學生運動之間的性質迥異，彼此的關聯性徹底地中斷了。

當然，〈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最初只是作為中共延安時期的一本教

---

四運動』的文章，我連看都不要看，他們只有黨派的立場，絕沒有客觀的判斷。」參見胡頌平編，《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北京：中國友誼出版社，1993），頁260。事實上，在不同人的記憶和詮釋中，五四新文化運動也呈現出不同的樣態。相關的研究，可參見羅志田，〈歷史創造者對歷史的再創造：修改「五四」記憶的一種嘗試〉，刊《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0年第5期（成都，2000.09），頁92-101；〈從科學與人生觀之爭看後五四時期對五四基本理念的反思〉，《歷史研究》，1999年第3期（北京，1999.05），頁5-23；以及（署名羅厚立）〈歷史記憶中抹去的五四新文化研究〉，《讀書》，1999年第5期（北京，1999.05），頁37-45。本文為主題計，側重於左翼知識分子和中共黨人對「五四」的認知、記憶、詮釋的分析和梳理。有關《新青年》左翼知識分子的思想轉向，參見尤小立，〈「公意」與五四前後《新青年》左翼同人的思想轉向〉，《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1期（南京，2010.01），頁55-72。

<sup>4</sup> 毛澤東，〈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收入竹內實監修，毛澤東文獻資料研究會編集，《毛澤東集》（東京：北望社，1970-1972），第7卷（延安期III），頁129。筆者使用的是東京一山圖書供應1976年的影印本，特此說明。

材出現，其作者也不止毛一人，隨後毛澤東儘管對相關章節進行了修改，但將「五四」作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端這一點並沒有發生變化。1940年1月，毛澤東又在〈新民主主義的政治與新民主主義的文化〉（即〈新民主主義論〉）中重申了「五四」作為新民主主義革命開端的作用。這個作用是從毛對近代中國歷史的重新建構反映出來的。他說：

自從 1840 年鴉片戰爭以來，即中國社會開始由封建社會改變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以來，就開始了的。中經太平天國運動，中法戰爭，中日戰爭，戊戌變法，辛亥革命，「五四」運動，「五三〇」運動，北伐戰爭，土地革命戰爭，「一二九」運動、直到今天的抗日戰爭，這樣許多個別的階段，費去了整整一百年工夫。<sup>5</sup>

很明顯，毛澤東所羅列的近代中國的轉折性事件，多是與戰爭、革命有關。在毛看來，「五四」不僅是革命的一部分，而且因為「五四」出現於一戰和蘇俄十月革命之後，故又是「世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一部分」。

此文出現之前，即 1939 年 5 月，在題為〈五四運動〉的紀念文章中，毛澤東曾將文化上的「五四」當成「反帝反封建的資產階級革命的一種表現形式」，<sup>6</sup>這也是後來〈新民主主義論〉中「一定的文化（當作觀念形態的文化）是一定社會的政治經濟的反映，又給予偉大影響於一定社會的政治經濟」的另一種表述。這實際將「五四」與政治掛上了鉤。

無產階級或中國共產黨領導當然不是「五四」的歷史特點，因為「五四」學生運動只是北京大中專學生自發的愛國運動，與政黨和階級並無直接的關聯。但毛澤東在處理這個問題時，一方面是將「六三」當成轉捩點，說「六三」以後，工人階級登上了歷史舞臺，同時，將後事提前，說「五四」已經為「文化生力軍」提供了人員上的準備，即「五四運動是在思想上和幹部上準備了 1921 年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又準備了五卅運動和北伐戰爭。」但此時，毛並沒有將李大釗的地位單獨提升成為後來惟一的中共創始人，而是將魯迅當作「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從而開啟了政治化的魯迅時代。

<sup>5</sup> 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解放》，第98、99期合刊（延安，1940.02.20），頁24。以下幾段引述，未另注者，均見此文。

<sup>6</sup> 毛澤東，〈五四運動〉，《解放》，第70期（延安，1939.05.01），頁9。

魯迅成為「五四」「文化革命」的主將，意味著「五四」在文化上已經不再與陳獨秀、胡適等新文化運動的領袖相關了。將新文化運動與「五四」區隔成兩種性質截然不同的兩個階段後，前者在被政治性地否定的同時，其內容被吸收進了後者之中，成為豐富後者的內涵和提升後者歷史地位的方式。當然，這種方式是悄然進行的，到 1949 年以後不僅是以正面灌輸，而主要是批判式的，是用批判的方式巧妙地使其讓渡的。

## (二)「反帝」和「反封建」：「五四」新意涵的出現

事實上，將「五四」視作「反帝國主義的運動」和「反封建主義的運動」以及「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均不自毛澤東始，早在 1920 年代左翼知識分子已經有此一說。李大釗 1924 年 5 月 1 日在〈這一週〉中說「五四」紀念日：

是中國全國學生對於帝國主義行總攻擊的紀念日。……我們在今天應該把國際帝國主義侵略我們的痛史，細數從頭，把「五四」運動的精神，牢牢記住，誓要恢復國家的主權，洗清民族的恥辱。<sup>7</sup>

同年 5 月 4 日，瞿秋白在〈自民族主義至國際主義〉中也提到了五四「反對帝國主義」的一面。<sup>8</sup>同年 12 月，陳獨秀在〈二十七年以來國民運動中所得教訓〉中回顧了近代以來「國民運動」的發展，並且把「五四」運動視作「接受世界的革命思潮，由空想而實際運動，開始了中國革命之新的方向。」他說：「這個新方向便是社會中最有革命要求的無產階級參加革命，開始表現他的社會勢力。」<sup>9</sup>

<sup>7</sup> 守常(李大釗)，〈這一週〉，原刊《北大經濟學會半月刊》，第 24 期(北京，1924.05.01)，收入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注，《李大釗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第 4 卷，頁 397。

<sup>8</sup> 瞿秋白，〈自民族主義至國際主義〉，《上海大學週刊》，第 1 期(上海，1924.05.04)，收入《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論編》(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第 2 卷，頁 537。

<sup>9</sup> 陳獨秀，〈二十七年以來國民運動中所得教訓〉，《新青年(季刊)》，第 4 期(上海，1924.12)，頁 19。陳獨秀對五四的闡釋也有一個變化過程，且與同代人的闡釋有著明顯的不同。具體的討論，參見尤小立，〈闡釋五四：陳獨秀與同代人的話語比較〉，《貴州社會科學》，2001 年第 1 期(貴陽，2001.01)，頁 99-104。

與反對帝國主義相比，「五四」反對封建主義的定位則出現較晚。1931年8月，茅盾(沈雁冰)曾指出：

「五四」是中國資產階級爭取政權時對於封建勢力的一種意識形態的鬥爭。換一句話，「五四」是封建思想成為中國資產階級發展上的障礙時所必然要爆發的鬥爭。

但他的論述是將新文化運動作為「五四」的一個階段，他並且認為，「五四」的反封建沒有取得成功，是「以妥協終(了)的『五四』，結果只有失敗。」<sup>10</sup>在1932年瞿秋白所撰之〈五四和新的文化使命〉中，「五四」的遺產，也是包括了反帝、反封建和科學、民權(主)的政治以及文化內涵的，<sup>11</sup>直到1935年北平的「新啟蒙運動」，無論是陳伯達、張申府等發起人，還是主要參與者艾思奇、何幹之，包括1937年時的胡繩，他們之間雖有觀點上的差異，「新啟蒙運動」前期和後期的理念也有明顯不同，<sup>12</sup>但在強化「五四」「反封建」一面上，卻也有著大致相同的言說，這也是他們與左翼前輩的不同之處。

陳伯達在「新啟蒙運動」發起之初，就比較強調「五四」的「打倒孔家店」。1936年在〈哲學的國防動員〉中，他說要「接受五四時代『打倒孔家店』的口號，繼續對中國舊傳統思想，傳統宗教，作全面的有系統的批判。」<sup>13</sup>一個月後，在〈論新啟蒙運動〉中，他又說：「五四時代的口號，如『打倒孔家店』、『德賽二先生』的口號，仍為我們的新啟蒙運動所接受，

<sup>10</sup> 分別見丙申(茅盾)，〈「五四」運動的檢討——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研究會報告〉，《文學導報》，第1卷第2期(上海，1931.08)，頁7、11。

<sup>11</sup> 易嘉(瞿秋白)，〈五四和新的文化使命〉，《北斗》，第2卷第2期(上海，1932.05)，頁328。

<sup>12</sup> 參見歐陽軍喜，〈論新啟蒙運動〉，《安徽史學》，第3期(合肥，2007.05)，頁57-59。有關「新啟蒙運動」的研究成果已相當多，有代表性的如舒衡哲(Vera Schwarcz)著，劉京建譯，丘為君校訂，《中國啟蒙運動——知識分子與「五四」遺產》第5章(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馮崇義，〈論30年代夭折的「新啟蒙運動」〉，《開放時代》，1999年第3期(廣州，1999.05)；陳亞傑，《當代中國意識形態的起源：新啟蒙運動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北京：新星出版社，2009)；房德鄰，〈再評1930年代的新啟蒙運動〉，收入鄭大華、鄒小站主編，《中國近代史上的激進與保守》(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

<sup>13</sup> 陳伯達，〈哲學的國防動員〉，《讀書生活》，第6卷第9期(上海，1936.09.01)，頁455。



而同時需要以新酒裝進舊瓶。」<sup>14</sup>張申府也看重「五四」反封建的一面，他說：「在對內上，在思想上，五四代表的潮流，對於傳統封建的思想，是加了重大的打擊。」<sup>15</sup>艾思奇則認為，康、梁的維新運動和辛亥革命都沒有真正動搖封建的勢力，而「五四運動是比較徹底的新文化運動，……對孔教的積極的攻擊，以及後來一天天佔勢力了的新社會科學工作者思想的出現，都不能不說是五四運動的功績。」<sup>16</sup>陳伯達當時已是中共北方局宣傳部長，他和「新啟蒙運動」的同人這樣說，也是有意針對彼時國民黨「尊孔讀經」宣傳的，這也是「新啟蒙運動」中，五四「反封建」一面被凸顯的現實原因。但總體看，「新啟蒙運動」的發起人和主要參與者對五四的評論仍是建立在廣義的五四運動(即五四新文化運動)之上的。

但毛澤東將「五四」作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端，新文化運動與「五四」的性質變得不同之後，顯然給後者吸收前者的內容帶來了困難。1938年在紀念「五四」十九週年時，《新華日報》發表的社論僅僅是從民族解放戰爭的角度來談「五四」傳統的繼承。<sup>17</sup>艾思奇1939年在〈五四文化運動在今日的意義〉中也只是提到了「五四」作為「民眾運動」，雖然他在努力挖掘「五四」的民族主義一面，但仍然將新文化運動與「五四」合而視之。<sup>18</sup>

### (三) 李大釗地位的提升和毛澤東進入「五四」領袖譜系

將李大釗作為「五四」最主要的領導人，是中共建構政治化「五四」

<sup>14</sup> 陳伯達，〈論新啟蒙運動〉，《新世紀》，第1卷第2期(上海，1936.10)，頁15。

<sup>15</sup> 見張申府，〈五四紀念與新啟蒙運動〉，《認識月刊》，創刊號(上海，1937.06)，頁65。

<sup>16</sup> 參見艾思奇，〈中國目前的文化運動〉，《生活星期刊》，第1卷第19期(上海，1936.10.11)，頁284。何幹之和胡繩的說法，分別見《近代中國啟蒙運動史》(上海：生活書店，1937)，頁122-135以及〈五四運動論〉，《新學識》，第1卷第7期(上海，1937.05)，頁333-338。不過，「新啟蒙運動」的發起者和主要參與者也同時認為，五四在反帝、反封建和提倡民主、科學上不夠徹底，所以要有所「繼承」和有所「超越」。

<sup>17</sup> 〈紀念五四〉，《新華日報》(延安)，1938年5月4日，1版。

<sup>18</sup> 艾思奇，〈五四文化運動在今日的意義〉，《新中華報》(延安)，1939年4月28日，6版，又見《艾思奇全書》(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第2卷，頁681-684。

重要的一環，也是政治化「五四」的一個新特點。這意味著中共主要創始人陳獨秀在政治化的「五四」歷史中的消失。

在提升李大釗地位方面起重要作用的是兩位中共黨內理論家何幹之和陳伯達。何幹之是中共黨內最早提升李大釗在「五四」中的至上地位的人。<sup>19</sup> 1937年2、3月間他開始起草《近代中國啟蒙運動史》，其中提到「五四啟蒙人物的哲學，是非常狹隘的。只有李守常的哲學思想，在五四啟蒙運動者中，才算傑出。」他說，李大釗的〈由經濟上解釋中國近代思想變動的原因〉「是中國人最先用唯物眼光，來考察思想史的嘗試。」不過，何幹之尚沒有神聖化李大釗，他也批評李沒有走出「地理唯物論的圈子」。<sup>20</sup> 陳伯達同意何幹之有關李大釗「唯物眼光」的判斷，正是他第一個將「問題與主義」的討論表述為一場政治上的「爭鬥」。<sup>21</sup>

這以後，起作用的是中共領導人博古和理論家艾思奇。在1939年5月發表的〈五四運動——中國現代史研究之一〉中，博古著重樹立的是李大釗的政治形象。他說，在五四運動中：

已經發現了社會主義鬥爭的思潮，這裡不能不紀念我們偉大的先驅戰士——李大釗同志，他在當時完全與陳獨秀、胡適之等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相反，他是中國無產階級天才的最初的代表者出現於運動中。<sup>22</sup>

<sup>19</sup> 從現有材料看，1936年，中共的「總負責」兼宣傳部長張聞天曾在延安抗日軍政大學講授「中國現代革命運動史」的課程，他曾組織一批人編寫並油印發行了《中國現代革命運動史》一書，其中已經在提升李大釗「五四」中的地位。但此書1937年冬才發行了第一個鉛印本。而從此書將李大釗、毛澤東等並舉的情況分析，現在的重版本所依據的底本中有關「五四」的內容，很可能是修改時，陸續更動和添加上去的，時間上應不會早於1937年二三月。有關《中國現代革命運動史》的版本考證，以及相關回憶和介紹，參見張聞天編著，《中國現代革命運動史》（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7），前言和附錄。

<sup>20</sup> 何幹之，《近代中國啟蒙運動史》，頁117、121-122。

<sup>21</sup> 1937年6月，陳伯達在〈論五四新文化運動〉中說：李大釗是「真正起來向五四主要啟蒙人物謬誤思想作爭鬥的（如胡適『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的爭鬥）」的「第一人」。參見陳伯達，〈論五四新文化運動〉，《認識月刊》，創刊號（上海，1937.06），頁94。

<sup>22</sup> 參見博古（秦邦憲），〈五四運動——中國現代史研究之一（上）〉，《新華日報》（延安），1939年5月4日，4版。

一年後，即1940年5月，艾思奇在〈五四文化運動的特點〉中更是將李大釗提到了至高無上的地位。他說：「中國的最初的馬克思主義者，與無產階級思想的最初代表者，如李大釗，就成為這徹底的民主主義思想最有力的支持者。」<sup>23</sup>此時已經擔任毛澤東政治秘書的陳伯達在〈紀念「五四」〉中也將李大釗表述為「五四運動的指導人」，且不再提及其他五四領導人。<sup>24</sup>

儘管毛澤東及其身邊的中共理論家已經在重寫「五四」的歷史，在中共黨內仍沒有立即形成共識。1942年5月4日《解放日報》的社論不僅將「五四」學生運動與新文化運動併提，而且將新文化運動的「反禮教」，提倡「科學」和「民主」一起加以肯定。社論還提到胡適的「實驗主義」，說胡適的「拿證據來」的口號，「用來反對舊社會的獨斷教義，曾發揮了它進步的有力的武器作用。」社論還將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中否定的新文化運動中提倡的「平民文學」說成是從文學形式上體現思想的解放。<sup>25</sup>

但1945年中共延安「整風運動」結束以後，有兩個明顯的變化。一個是隨著「毛澤東思想」進入中共黨章，成為中共的指導思想，毛澤東對「五四」政治性定位的權威性也基本得到確立。1946年5月，何幹之再次論及李大釗時，批評的話語已隱然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政治上的全面肯定。他說：「五四時代最先宣傳馬克思的辯證法和唯物論的，李大釗是一個」、「李大釗利用了馬克思的發展觀、矛盾觀來謳歌中國的新生，這是戰鬥的人生觀，這是革命的哲學。」<sup>26</sup>

另一個明顯的變化是，毛澤東開始正式進入了「五四」歷史之中，成為主要的領導人。1948年，中共文藝界的領導人邵荃麟在〈「五四」的歷史意義〉一文中就引用了毛澤東的說法，並在全面肯定「五四」意義的同時，努力提升毛澤東及其思想的地位。<sup>27</sup>而在這一建構過程中最重要的人物

<sup>23</sup> 艾思奇，〈五四文化運動的特點〉，原刊《中國文化》，第1卷第3期(延安，1940.05)，收入《艾思奇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第1卷，頁496。

<sup>24</sup> 伯達(陳伯達)，〈紀念「五四」〉，《新中華報》(延安)，1940年5月10日，4版。

<sup>25</sup> 參見〈發揚五四的啟蒙精神〉，《解放日報》(延安)，1942年5月4日，1版。

<sup>26</sup> 何幹之，〈五四運動及其發展〉，《北方文化》，第1卷第5期(張家口，1946.05)，頁10。

<sup>27</sup> 參見荃麟(邵荃麟)，〈「五四」的歷史意義〉，《群眾》，第2卷第17期(香港，1948.05.06)，頁14-17。

是中共黨內以研究「五四」運動著稱的歷史學家華崗。

1939年，華崗撰寫《中國民族解放運動史》一書時就涉及「五四」的內容。<sup>28</sup>1949年5月，為紀念「五四」運動三十週年，他發表了〈中國新民主主義文化的產生和發展〉一文。<sup>29</sup>此文無論思路，還是具體論斷，幾乎完全出自毛澤東的〈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和〈新民主主義論〉，甚至直接套用其中的語句，具體情況，參見表1：

表1：毛澤東〈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新民主主義論〉與華崗〈中國新民主主義文化的產生和發展〉相關內容對照簡表

	〈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 〈新民主主義論〉(毛澤東)	〈中國新民主主義文化的產生和發展——紀念五四運動三十週年〉 (署名林石父，即華崗)
「五四」的 歷史地位	現時中國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革命，已不是舊式的一般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革命，……而是新式的特殊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這個過程……，在中國則是從1919年五四運動開始的。 <sup>30</sup>	五四運動，是中國近代史上空前的一次人民覺醒運動，是中國革命史上劃時期的一次群眾救國運動，是中國人民群眾自己動員起來所勇猛進行的反帝反封建運動。它表現了新穎的歷史特征，成為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端。 <sup>31</sup>

<sup>28</sup> 《中國民族解放運動史》第1卷，1940年8月由上海讀書出版社初版，第2卷於同年9月由上海讀書出版社初版。後者乃根據作者1929年所撰之《1925年至1927年的中國大革命史》(上海：春耕書局，1931)改寫而成。

<sup>29</sup> 林石父(華崗)，〈中國新民主主義文化的產生和發展——紀念五四運動三十週年〉，《群眾》，第3卷第19期(香港，1949.05.05)，頁4-6、15。

<sup>30</sup> 毛澤東，〈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頁129。

<sup>31</sup> 林石父(華崗)，〈中國新民主主義文化的產生和發展——紀念五四運動三十週年〉，頁4。

有關「五四」領導者的定位	<p>在「五四」以前，中國的新文化運動，中國的文化革命，是資產階級領導的，他們還有領導作用。在「五四」以後，這個階級的文化思想卻比較它的政治上的東西還要落後，就絕無領導作用，至多在革命時期在一定程度上充當一個盟員，至於盟長資格，就不得不落在無產階級文化思想的肩上。這是鐵一般的事實，誰也否認不了的。<sup>32</sup></p>	<p>這種新民主主義文化革命的性質，雖然要到1921年中國工人階級及其先鋒隊——中國共產黨躍登政治舞臺，中國產生了完全嶄新的文化生力軍以後，才能顯出它的真實意義，但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雖然像胡適之流，始終沒有跳出改良主義與買辦思想的範圍，其後更一步步墮落到反革命道路上去，可是同時卻也出現了不少贊成俄國十月革命的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先進知識分子，其代表人物就是李大釗和毛澤東。<sup>33</sup></p>
有關「文化生力軍」的描述	<p>在「五四」以後，中國產生了完全嶄新的文化生力軍，這就是中國共產黨人所領導的共產主義的文化思想，即共產主義的世界觀（按：後改為「宇宙觀」）與社會革命論。「五四」運動是在1919年，中國共產黨的成立與勞動運動的真正開始，是在1921年，均在第一次世界大戰與十月革命之後，即在民族問題和殖民地運動在世界上改變了過去面貌之時，這種中國革命與世界革命的聯繫，是非常之顯然的。由於中國政治生力軍——中國無產階級與中國共產黨，登上了中國的政治舞臺，這個文化生力軍，就以新的裝束和新的武器，聯合一切可能的同盟軍，擺開了自己的陣勢，向著帝國主義文化與封建文化展開了英勇的進攻。這枝生力</p>	<p>五四以後，中國產生了完全嶄新的文化生力軍，這就是中國共產黨人領導的共產主義的文化思想，即馬列主義的宇宙觀和社會革命論。五四運動是在1919年，中國共產黨的成立，中國現代工人運動的真正開始，是在1921年，都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和十月革命之後。在這時候，世界形勢已經發生根本變化，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運動，已經由世界資產階級革命的同盟軍，變為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同盟軍。在中國由於工人階級及其政黨躍登政治舞臺，於是在文化戰線上，也就以新的武器和方法，聯合一切可能的同盟軍，展開了自己的陣勢，向著帝國主義文化與封建文化實行進攻。這支生力軍，雖然還沒有來得及在自然科</p>

<sup>32</sup> 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頁36-37。

<sup>33</sup> 林石父（華崗），〈中國新民主主義文化的產生和發展——紀念五四運動三十週年〉，頁4。

	軍雖然還沒有來得及在自然科學領域佔領陣地與進行戰鬥，一般地暫時還讓自然科學為資產階級的宇宙觀所統治，但在社會科學領域，在這個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時代最重要的思想武器領域，卻引起了極大的革命。 <sup>34</sup>	學領域佔領陣地與進行戰鬥，一般地暫時還讓自然科學為資產階級的宇宙觀所統治；但在社會科學領域，在這個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時代最重要的思想武器的領域，卻引起了極大的革命。 <sup>35</sup>
「新民主主義文化」的性質和特徵	在「五四」以前，中國的新文化，是舊民主主義性質的文化，屬於世界資產階級的資本主義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在「五四」以後，中國的新文化，卻是新民主主義性質的文化，屬於世界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 <sup>36</sup>	……在五四以前，中國新文化乃是舊民主主義性質的文化，屬於世界資產階級的資本主義文化革命的一部分；在五四以後，中國的新文化，卻是新民主主義性質的文化，屬於世界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文化革命的一部分。 <sup>37</sup>

華崗的一個「創新」，就是將毛澤東放置在「五四」時「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先進知識分子」的譜系中，成為與李大釗並立的兩個「五四」政治上的傑出代表之一。另外，在華崗筆下，一些原本與「五四」有關，但並不起主要作用；或與「五四」並無直接關係的中共領導人的名字也開始與「五四」緊密相關了。像劉少奇、鄧仲(中)夏、陳延年、李立三、周恩來、李富春等中共早期和 1949 年後的領導人都以不同的方式進入了『五四』歷史。」<sup>38</sup>華崗隨後依據毛澤東的論斷寫出的非常政治化的《五四運動史》，很快成為國家意識形態的載體——欽定的教科書，通過國家權力的推

<sup>34</sup> 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頁36。

<sup>35</sup> 林石父(華崗)，〈中國新民主主義文化的產生和發展——紀念五四運動三十週年〉，頁4。

<sup>36</sup> 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頁36。

<sup>37</sup> 林石父(華崗)，〈中國新民主主義文化的產生和發展——紀念五四運動三十週年〉，頁4。

<sup>38</sup> 這幾人中，只有鄧中夏和周恩來參與過「五四」學生運動。鄧中夏(1894-1939)，1919年為北大哲學系學生，「五四」運動時出任北京學生聯合會總務幹事；周恩來(1898-1976)，1919年在天津參與組織覺悟社，參加天津響應「五四」的學生活動。其他如陳延年(1898-1927)、李立三(1899-1967)、劉少奇(1898-1969)和李富春(1900-1975)並未在「五四」歷史中留下足跡。

動，在 1950 年代的中國大陸大量印刷發行，<sup>39</sup>其基本觀點和體例，也不僅影響到後來中國大陸五四運動史的研究和書寫，<sup>40</sup>也使充滿毛澤東色彩的「五四」的政治話語和政治形象開始在中共黨內確立。

隨著「五四」領袖新譜系的確立，譜系以外的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其他領袖(如老師輩的北大教授胡適、周作人、高一涵、錢玄同，預科教授劉半農以及學生輩的北大學生傅斯年、羅家倫、段錫朋等)漸漸淡出了後世人們的視野。

雖然「五四」的政治形象和政治話語在 1949 年 10 月前已基本確定，但要讓人們接受，並視作權威性的「歷史」，還要通過反向的批判或思想改造的方式加以強化，才能最終完成。

### 三、胡適「政治反動性」的建構

眾所周知，胡適是五四時期白話文運動的旗手，又是「五四」青年心目中的領袖。要重新建構意識形態化的「五四」歷史，書寫新的政治話語，塑造新的政治形象，批判「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代表」胡適就勢所必然。現在看來，中共對胡適批判主要採取兩種方式：其一，是政治上的定性和批判，以確定胡適的「反革命性」、「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代表」、「美帝國主義走狗」和「獨裁者蔣介石的僮僕」為主；其二，是理論性和歷史性地切割，即將胡適塑造成五四的「反面角色」，甚至剔除在五四歷史之外。

#### (一)「美帝國主義走狗」和「獨裁者蔣介石的僮僕」：

##### 胡適的反革命性

中共對胡適的批判開始於 1947 年初。在國民黨操縱的「國大」召開以及中共與國民黨的決裂後，參加「國大」的胡適也成了連帶的政治犧牲品。

<sup>39</sup> 華崗著《五四運動史》1951年由上海海燕書店初版，初版印刷，計11次；1953年修訂再版，兩版的累計印數為126000冊；1954年又由上海華東人民出版社出版。但據向陽編著，《華崗傳》(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所附〈華崗著作年表〉說，此書初版時間是1949年。

<sup>40</sup> 如彭明，《五四運動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在政治立場和觀點上，就明顯受到華崗同名著作的影響。

胡適 1947 年 2 月曾說：

自從我出席國大以後，共產黨與民盟的刊物(如《文萃》，如《文匯報》)用全力攻擊我。(最近兩期《文萃》，每期有兩篇文章攻擊我。)他們最恨我的，一是因為我出席國大，一是因為我把女生沈崇案引起的學潮鎮定下去了。<sup>41</sup>

有學者認為，夏康農 1947 年初在上海發行的《文萃》週刊這份由中共地下黨負責的刊物上發表的〈清理胡適之的脈絡〉一文代表了中共組織的意願和當時中共理論家對胡適的理解和評價，也是政治上批判胡適開始的一個標誌。<sup>42</sup>這個說法是有道理的，此處可以再提供幾條證據。

1947 年 2 月 5 日，郭沫若寫有〈替胡適改詩〉，嘲弄胡適「只是『微近中年』而非半老徐娘。」<sup>43</sup>12 日，他又撰〈斥帝國臣僕兼及胡適——復泗水文化服務社張德修先生函〉，其中說：

胡適學無根底，僥倖成名，近二三年來更復大肆狂妄。蔣介石獨裁專擅，禍國殃民，而胡為之宣揚『憲法』，粉飾『民主』，集李斯、趙高、劉歆、楊維之醜德於一身而恬不知恥。更復蠱惑青年，媚外取寵，美國獸兵，強姦沈崇，竟多方面為之開脫。平日蒙上『自由主義者』之假面具，高唱『理未易明，善未易察』之濫調，以鄉願賊德，毒害學生。<sup>44</sup>

1948 年 2 月 28 日，在〈駁胡適「國家形勢裡的兩個問題」〉中，郭沫若指責胡適說：「你在拼命替美國辯護，比美國人自己還要辯護得起勁，我知道你已經不是『人』了，至少你已經不是我們中國人的這種『人』了。」<sup>45</sup>同年 5 月 14 日，郭沫若在香港《華商報》「熱風」專欄的短文〈「三無主義」疏證〉裡，更是對胡適進行露骨的謾罵。他不僅歪解胡適自嘲之「無知」、

<sup>41</sup> 參見胡適 1947 年 2 月 22 日致王雪艇(世杰)的信，收入胡頌平編著，《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4)第 6 冊，頁 1960。

<sup>42</sup> 參見謝泳，〈胡適思想批判與《胡適思想批判參考資料》〉，《開放時代》，2006 年第 6 期(廣州，2006.11)，頁 50。感謝廈門大學中文系教授謝泳兄惠賜原稿。

<sup>43</sup> 此文寫作時間可以確定，但原始出處待考，見《沫若文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3)第 13 卷，頁 438。

<sup>44</sup> 見《自由叢刊·渡江前夜》，第 12 種(香港：自由世界出版社，1948.03)，頁 23-24。

<sup>45</sup> 參見《光明報》，新 1 卷第 1 期(香港，1948.03.01)，頁 9-10。



「無能」、「無為」，又臆添「無恥」，最後斥胡適「無恥！無恥！第三個還是無恥！」<sup>46</sup>郭氏譏諷罵式文風，也遺傳到了後來的「胡適思想批判」運動中。

新華社的社論也證明夏康農和郭沫若對胡適的指責並非個人偏好而確是出自中共組織的意願。1947年5月4日，新華社題為〈五四運動二十八週年〉的社論說：「當年資產階級文化運動的參加者胡適，現在已經『做了過河卒子』，墮落為美國帝國主義及獨裁者蔣介石的僮僕。」<sup>47</sup>此後，對胡適的政治性批判一直延續著，並且有火力漸猛的趨勢。

邵荃麟是1946年由周恩來派往香港做「地下工作」的，擔任中共香港工委文委委員和文委書記、工委副書記。1948年5月，他在香港《群眾》雜誌上發表的〈「五四」的歷史意義〉也對胡適與「五四」關係進行了重新的政治解讀。文中說到，「昔日『五四』的健將，今天是屠殺青年的著名劊子手。」此處所指自然是胡適。在邵荃麟看來，胡適將五四視為「中國的文藝復興」是抹煞了「人民大眾反帝反封建的自覺精神。」他進而否定了五四精神中與胡適相關的「人的自覺」，代之以「人民的自覺」。他說：

「五四」以後，中國人民革命運動的迅速展開，就說明這個事實。胡適只看到他自己階級的「人」，卻忘記了最廣大的中國人民；著重個人的解放，忘記了人民的解放。他一開始就和人民站在對立的地位，這是他一切反動思想的根源。……他抹煞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的自覺精神和鬥爭事實，並不是無意的。他企圖主觀地把「五四」解釋為一種單純資本主義的文化運動，而以自己為其代表。他想替中國幻想出一條歐美資本主義國家的舊路，但是這條路是走不通了，於是胡適只有摸回老路，投到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的懷抱裡，去做反動思想的先鋒了。<sup>48</sup>

而在此前後，新華社曾經兩次借莫斯科電臺廣播的報導和莫斯科電臺評論員馬西努之口稱胡適為「美帝國主義的走狗」和「麻痹人民警覺，為

<sup>46</sup> 具體見《華商報》(香港)，1948年5月14日，3版。

<sup>47</sup> 參見新華通訊社編印，《新華社社論集(1947-1950)》(北京：新華通訊社，1960)，頁18。

<sup>48</sup> 以上均見荃麟(邵荃麟)，〈「五四」的歷史意義〉，頁14-17。

美扶日政策狡辯。」<sup>49</sup>四個月後，即 10 月 18 日，新華社的報導不再借用外電，而是直斥「胡適派反動教授真形更顯露」，「已經比以前更加死心塌地為國內外最反動的分子效忠。」<sup>50</sup>到 1949 年 3 月 29 日，新華社就胡適 22 日在臺北對國民黨中央通訊社記者的談話發表評論，直指胡適為「顛倒黑白的無恥奴才」，<sup>51</sup>4 月 28 日又針對胡適在美國三藩市對媒體的談話，斥胡適「閉緊眼睛吹牛。」<sup>52</sup>

## (二) 討論成了「思想戰」：理論和歷史的切割

相對現實中胡適「政治反動性」的批判，對中共來說，深層的理論上和歷史上建構胡適思想「反動性」的意義更為重大。而「五四」後期，胡適與李大釗兩位同人有關「問題與主義」的討論被誇大為「馬克思主義與實用(驗)主義分道揚鑣的標誌」，成為所謂意識形態化的「問題與主義之爭」，正是這一訴求的反映。

從現有材料看，從理論上和歷史上建構胡適思想「反動性」始於 1940 年代初。因為 1937 年 2、3 月間何幹之撰寫《近代中國啟蒙運動史》時僅是說：「在胡適大談『多研究些問題』的時候，李先生(按，指李大釗)已提出了相反的見解，認為研究問題不能離開方法，缺了主義。」<sup>53</sup>前面提及的 1937 年 6 月，陳伯達有關「問題與主義」的討論是一場「爭鬥」的表述，也沒有立即引起連鎖反應。但到 1942 年，艾思奇的說法，則有了明顯的變化。這年 5 月 4 日，他將「問題與主義」的討論作為「五四」的「一個重要爭論」，加以特別地「介紹」，他說：

<sup>49</sup> 分別參見新華社，〈蘇廣播斥美走狗胡適曾琦〉，《人民日報》(石家莊)，1948年2月26日，第2版；〈胡適麻痺人民警覺 為美扶日政策狡辯——馬克努評胡媚美賣國論調〉，《人民日報》(石家莊)，1948年6月24日，2版。

<sup>50</sup> 〈胡適派反動教授真形更暴露 發表無恥宣言吹彈戰販濫調〉，《人民日報》(石家莊)，1948年10月18日，2版。

<sup>51</sup> 〈顛倒黑白的無恥奴才 美帝走狗胡適顧維鈞 竟為大西洋公約辯護〉，《人民日報》(北平)，1949年3月29日，3版。

<sup>52</sup> 〈美帝走狗胡適閉緊眼睛吹牛 乞求美國主子救命〉，《人民日報》(北平)，1949年4月28日，3版。

<sup>53</sup> 何幹之，《近代中國啟蒙運動史》，頁117。

在五四文化運動中，有一個重要的，關於『問題與主義』的爭論，這是五四文化運動中無產階級思想代表人與富於妥協投降性的自由資產階級的思想代表人——李大釗同志與胡適中間的思想方法上的爭論，也是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誕生後一次重要的思想戰。<sup>54</sup>

1946年底，胡適赴南京參加「國大」成了轉捩點，以後不斷有左翼人士和中共黨人批判胡適，且在艾思奇說法的基礎上，進一步強化李大釗與胡適之間，馬克思主義與實用(驗)主義之間的對立，並逐漸形成「標準答案」。典型者如1949年4月28日，中共的元老、華北大學校長吳玉章在〈紀念李大釗同志——光榮殉難的二十二週年〉中說「(李)大釗同志是三十年前中國馬克思主義及布林什維主義最早的宣導者，歌頌者，是中國人民及中國共產黨最早的組織者和領導者。」<sup>55</sup>4月29日，《人民日報》總編鄧拓發表的〈誰領導了五四運動？〉一文，則在突出李大釗「五四」的領導地位的同時，直接褫奪了胡適新文化運動的代表權。<sup>56</sup>同年5月4日，吳玉章又在〈紀念「五四」三十週年應有的認識〉中說，新文化運動的領導者不是胡適而是李大釗，並且重提胡、李的「問題與主義」之爭。<sup>57</sup>與此同時，何幹之的〈五四的兩個基本口號〉，則徑直指責胡適通過「問題與主義」之爭

<sup>54</sup> 艾思奇，〈介紹五四文化運動中的一個重要爭論〉，《解放日報》(延安)，1942年5月4日，4版。此文後來以修改稿行世。修改稿最早收入《「有的放矢」及其他——哲學·文藝·隨感集》(上海：海燕書店，1951)，頁17-33，又見《艾思奇文集》第1卷，頁629-640及《艾思奇全書》第3卷，頁300-311。但《艾思奇文集》附注的刊登日期有誤。另外，張豔已經注意到艾思奇此文「是迄今發現的中國共產黨人研究『問題與主義』之爭的第一篇論文」，1942年5月4日《解放日報》上的初刊本與修改稿有較大的差距，其中初刊本中對胡適思想相對緩和的批評以及部分地肯定都更改為絕對地批判。兩個版本的具體對照，參見張豔，〈對五四時期「問題與主義」之爭歷史闡釋的學術解讀〉，《中共黨史研究》，2010年第5期(北京，2010.10)，頁60-62。不過，儘管初刊本中肯定了胡適及實驗主義的歷史作用，但從它一開始將「問題與主義」之爭表述成「思想戰」，亦不難發現，艾氏已經將這一討論視作馬克思主義者與實驗主義者分道揚鑣的標誌了。

<sup>55</sup> 吳玉章，〈紀念李大釗同志——光榮殉難的二十二週年〉，《人民日報》(北平)，1949年4月28日，4版。

<sup>56</sup> 鄧拓，〈誰領導了五四運動？〉，《人民日報》(北平)，1950年4月29日，4版。

<sup>57</sup> 吳玉章，〈紀念「五四」三十週年應有的認識〉，《人民日報》(北平)，1949年5月4日，4版。

阻止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sup>58</sup>

應該說，將「問題與主義」之爭作為馬克思主義與實用(驗)主義分道揚鑣的標誌，不僅為建構胡適思想「反動性」提供理論和歷史的依據，而且也將「五四」歷史納入到毛澤東新民主主義的理論框架之中。

### (三)「不是革命，就是反革命」：劃清界限和輔助性參與擬「新史」

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對胡適的零星批判不時出現。較早的如著名哲學史家、與胡適有師生和同門之誼的馮友蘭1950年12月16日在《進步日報》上發表的〈實用主義的本質〉一文，<sup>59</sup>但對胡適有組織和有規模的批判，始於1951年11月的高等學校「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

由毛澤東發起的「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包括兩部分：一是思想改造，一是「忠誠老實」運動，即查個人政治歷史。<sup>60</sup>接受改造的主要是高等學校的舊知識分子，其中「思想改造」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批判胡適思想。

據1951年11月12日新華社的報導，一個月來，京津地區高校參加學習的教師已經增加到6188人，「北大文、法兩學院已經開始討論對胡適的看法。」<sup>61</sup>同年11月14日晚和12月2日下午，北京大學校方和《大公報》分別召集北大和滬上幾所大學的知名教授召開座談會，批判胡適。<sup>62</sup>新華社12月5日的報導說：

<sup>58</sup> 何幹之，〈五四的兩個基本口號〉，《人民日報》(北平)，1949年5月4日，5版。

<sup>59</sup> 馮友蘭，〈實用主義的本質〉，原刊《進步日報》(天津)，1950年12月16日，收入黃裳、潘際桐編，《從墮落到反動的美國文化》(上海：平明出版社，1951)，頁18-25。馮氏在批判美國實用(驗)主義的同時，也批判了胡適。

<sup>60</sup> 參見李洪林，《中國思想運動史》(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99)，頁52。

<sup>61</sup> 參見〈開始聯繫實際檢查和批判錯誤思想〉，《人民日報》(北京)，1951年11月13日，1版。

<sup>62</sup> 參見胡明，《胡適傳論》(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6)下卷，頁968-972。此段文字曾以〈胡適批判的歷史理解與文化詮釋〉為題，收入劉青峰編，《胡適與現代中國的文化轉型》(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4)，但文字上略有增減。《大公報》召集上海部分大學教授開「胡適思想批判座談會」的情況，見顧頡剛，《顧頡剛日記》(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7)第7卷，頁143。另外，胡適1951年12月7日日記附有《大公報》11月30日的報導剪報，《胡適全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第34卷，頁146-148。

為了引導學習密切聯繫實際，各校教師都選擇了本校中突出的人物，進行分析，接著就聯繫自己的思想，進行批判。如北京大學討論和分析了胡適的思想，燕京大學討論了司徒雷登的問題，南開大學討論和分析了張伯苓的思想，清華大學教師討論和分析了該校前校長梅貽琦的思想。各校教師在對這些具體人物的討論中，一般都聯繫著自己的思想進行檢討，使學習逐步深入。<sup>63</sup>

1951年12月，北京《新觀察》雜誌上刊登了美學家、北京大學教授朱光潛的〈澄清對於胡適的看法〉。此文是作為「思想改造運動」中的一個「改造典型」而被遴選發表的。朱光潛曾與胡適共事七年，文中也自認是胡適「我的朋友」之一，但此文得以發表，主要還是因為符合上面的精神。這個精神的基本特徵就是泛政治化，即「政治掛帥」。朱光潛說：

學術思想和政治思想是分不開的。一個人不可能有真正反動的政治思想，而同時卻有真正進步的學術思想。

儘管你自覺清高，談學術不談政治，甚至在某些問題上反對國民黨，你沒有走入革命陣營，便會捲入國民黨那個反動陣營，你和你同路人儘管反動的罪行有大小之別，而所站的立場還只是同一反動的立場。<sup>64</sup>

朱光潛在此文和另一篇題為〈最近學習中幾點檢討〉的檢討中反復說到的「從五四運動之後，中國知識分子基本上只有兩條路可走，不是革命，就是反革命」，<sup>65</sup>確實揭示了1949年後，舊知識分子面臨的現實境遇。因為擺在他們面前的是一種非此即彼的選擇，而所謂的「站隊」，其實只有一邊可選。

1952年6月毛澤東在給中共中央統戰部文件所寫的批示中，將無產階級與民族資產階級的矛盾當作「主要矛盾」，他不再承認有「中間階級」存

<sup>63</sup> 〈京津高等學校教師思想改造學習運動逐步深入〉，《人民日報》（北京），1951年12月05日，1版。

<sup>64</sup> 朱光潛，〈澄清對於胡適的看法〉，《新觀察》，第3卷第9期（1951.12.01），頁8，又見《朱光潛全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第10卷，頁27、31。

<sup>65</sup> 朱光潛，〈最近學習中幾點檢討〉，《人民日報》（北京），1951年11月26日，3版。

在，也就是說，民族資產階級成為了革命的對象，<sup>66</sup>這更讓一些所謂資產階級舊知識分子，特別是胡適曾經的同事和學生如坐針氈。他們只好作「單向選擇」，並且在自我改造的同時，通過參與胡適「政治反動性」的建構，獲得自我的一點尊嚴和生存權。

這期間，曾受惠於胡適的文史學家陸侃如和歷史學家顧頡剛的表現代表了兩種類型。陸侃如 1949 年前後反差極大的言行和顧頡剛從弄假成真到認假為真的轉變，其結果都輔助性地支援了胡適「政治反動性」，乃至政治化「五四」的建構，從而成為胡適「政治反動性」建構的組成部分。由此亦可見，1949 年後，毛澤東發起的政治運動和思想改造運動對大陸知識分子思想與精神的整體挾持和裹脅。

陸侃如 1924 年畢業於北京大學中文系，後入清華學校研究院，師從王國維和梁啟超。其與胡適通信聯繫始於 1920 年。<sup>67</sup>此後往來頻繁，並多次受到胡適提攜。1923 年，經胡適推薦，尚在北大國文系讀大二的陸侃如的著作《屈原》由上海亞東圖書館出版。1928 年 5 月，陸侃如和女友，作家、文學史家馮沅君，又受時任上海中國公學校長胡適邀請，至中國公學任教授兼國學系（後由陸改為中國文學系）主任，甚至在陸侃如與馮沅君的婚姻問題上也得益於胡適的幫助。<sup>68</sup>與胡適交往中，陸侃如一直執弟子禮，其對胡適的態度，可以 1928 年 5 月 27 日致胡適的信為例。信中說：「每年 11 月 24 日，是我們開始認識的紀念日。」<sup>69</sup>從 1920 年與胡適通信算起，至 1928 年已過去八年，陸侃如仍清楚記得他們相識的時間，可見他對與胡適關係的珍惜。然而，1949 年後，在政治壓力之下，陸侃如的反戈一擊在留在大

<sup>66</sup> 李洪林，《中國思想運動史》，頁 52。

<sup>67</sup> 其時，尚在北京師範學校學習的陸侃如寫信向胡適請教讀書的問題。陸侃如致胡適信，收入杜春和、韓榮芳、耿來金編，《胡適論學往來書信選》（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下冊，頁 689。

<sup>68</sup> 有關陸侃如與馮沅君的婚姻，因沅君長兄馮友蘭瞭解到陸在江蘇海門家鄉已有婚約，故加以反對，並有意將其妹許配給陳寅恪。後馮沅君向胡適、蔡元培求援，於是胡適寫信給馮友蘭，迫後者同意了陸、馮結婚。馮友蘭及馮沅君有關此事致胡適的信，參見耿雲志編，《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合肥：黃山書社，1994）第 36 冊，頁 596-598、606-607。另，胡適日記 1929 年 3 月 28 日條亦記曰：去信馮芝生（友蘭），「談馮沅君與陸侃如婚事。」《胡適全集》第 31 卷，頁 1。

<sup>69</sup> 參見杜春和、韓榮芳、耿來金編，《胡適論學往來書信選》下冊，頁 705。

陸與胡適有關的同事和學生中顯得相當突出。

1949年後，陸侃如是受到中共重用的，他先後出任山東大學校務委員會副主任和副校長，且被評為一級教授，但以往與胡適的關係卻是不易抹去的所謂「歷史污點」。<sup>70</sup>現實地位與「歷史污點」的反差也促使他異常積極地參與「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和「胡適思想批判」運動。1950年4月，華崗出任山東大學校長兼黨委書記，他對知識分子思想改造的態度自然是積極回應，<sup>71</sup>但據趙儷生回憶，華崗還知道分寸，另一位山東大學黨委副書記更熱衷於羅織罪名，以迫害的方式改造知識分子。<sup>72</sup>這也給陸侃如造成了極大的心理壓力。

像許多舊知識分子一樣，陸侃如的自我檢討和批判也是擠牙膏式的，在政治壓力下，一點一點地在「靈魂深處鬧革命」；相應的，對於胡適反戈一擊的程度也呈現愈演愈烈的態勢。

陸侃如最早公開批判胡適的文章是1950年5月4日發表在山東大學內部刊物《山大生活》上的〈五四的教訓〉。其中寫道：

五四運動的第二年，我考上了北大，我到了新文化的策源地北京。和當時的其他青年一樣，我馬上便成了胡適的崇拜者。我熟讀他每一篇文章，甚至摹仿他的字體。他家裡擠滿了青年學生，我幾乎天天去和他談話。但漸漸地他讓我們失望。當軍閥段祺瑞做「執政」時，他做了「執政」的幕僚。他又和其他舊官僚們，提倡什麼「好人政治」。他家門口漸漸的不再擁擠著衣衫襤褸的學生，而漸漸的排列著流線型的小汽車了。這還是二十五年前的事。後來他做了蔣匪幫的尾巴，那是毫不足怪的。<sup>73</sup>

<sup>70</sup> 1957年陸侃如被劃為「資產階級右派分子」，除了他發表文章贊成取消高等學校黨委制以外，與胡適關係也是一個原因。參見許志傑，《陸侃如與馮沅君》（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7），頁56。

<sup>71</sup> 1952年8月印行的《山東大學思想改造文集》中前十篇都是華崗的報告和講話，參見山東大學教務處校刊編輯室編輯，《山東大學思想改造文集》（青島：山東大學教務處校刊編輯室印行，1952），頁1-110。

<sup>72</sup> 趙儷生當時是山東大學歷史系「八大教授」之一。具體見趙儷生、高昭一，《趙儷生高昭一夫婦回憶錄》（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頁135-136。

<sup>73</sup> 轉引自許志傑，《陸侃如與馮沅君》，頁118-119。

陸侃如接著強調，至遲在 1927 年，其文藝觀已有別於胡適了。這自然不是事實。<sup>74</sup>

這種自我辯解和掩飾在 1952 年 2 月 4 日發表的〈用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法開展思想改造運動——加緊改造思想，迎接新的戰鬥任務〉一文中又有了新的變化。雖然在文章開頭，陸侃如再次提到「我在二十年前就讀過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書籍，解放前曾一再被列入『黑名單』內」，但外界有形或無形的壓力，讓他不能不正視與胡適的關係問題。他檢討說：

由於學習的不認真，在我腦子裡至今還是新舊思想和平共居。我發現我的思想中仍存在著濃厚的胡適的影響，而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只成了外表的點綴。三十幾年前，我在北京大學讀書時，投入了五四運動所掀起的新文化運動，卻誤認為胡適是這運動的領導人，五體投地地崇拜他。他給我影響最深的有兩點：第一是否認階級的存在，否認革命的必要，而主張一點一滴的改良；第二是強調為學術而學術，鼓勵理論與實際脫節，認為發現一個字的古義與發現一顆恒星的貢獻是相等的。因此，我覺得他的「歷史癖」與「考據癖」很合我的脾胃，而把全部精力化在「整理國故」上。

談到 1931 年出版的《中國詩史》(上、中卷)，他說：

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文藝理論和反動的改良主義思想在我腦子中混淆起來，糾纏起來，使我寫了些四不像的書如《中國詩史》等，在出版界欺騙了一些讀者，在大學裡又欺騙了一些學生。回想起來，慚悔何及！<sup>75</sup>

同年 5 月，陸侃如又發表了更為系統的〈紀念五四，批判胡適〉。繼續對胡適反戈一擊，說明他的心理壓力依舊不減。陸侃如急切地表現自己「革命」的一面，必然要將胡適「反革命」的一面放大。他說：

<sup>74</sup> 據徐雁平研究，1931 年出版的《中國詩史》(上、中卷)在分期和研究方法上都受到胡適的影響，且多次引用了胡適《白話文學史》中的論點。參見徐雁平，《胡適與整理國故考論——以中國文學史研究為中心》(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頁 219-230。

<sup>75</sup> 以上均見陸侃如，〈用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法開展思想改造運動——加緊改造思想，迎接新的戰鬥任務〉，《人民日報》(北京)，1952 年 2 月 4 日，3 版。



三十多年來，在文化教育界散播資產階級反動思想最厲害而至今還保存一定程度的壞影響的，就是那個冒充五四運動「領袖」，甘心做帝國主義和蔣匪幫的走狗，一貫出賣祖國人民的利益的戰犯胡適。

在「三反」、「五反」運動中間紀念五四，批判胡適是完全必要的工作。只是他的階級劃分方法運用得還不夠純熟，仍將陳獨秀、錢玄同、吳虞與魯迅並列在「革命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中，但在態度上是「積極的」，其表現便是把毛澤東放到了李大釗的前面，說：「『毛主席和李大釗先生等代表五四運動的左翼』，魯迅是『革命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代表人物，胡適則是『徹頭徹尾的資產階級代言人。』」

〈紀念五四，批判胡適〉引人矚目之處在於，全文幾乎全部依據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及華崗《中國民族運動史》有關「五四」的定位。這種不顧史實地參與擬定「新史」固然是出於無奈或被迫為之，但其「示范效應」對胡適「政治反動性」的建構也是一種輔助性的推動，因而成為反向建構中極特殊的一種類型。

不過，從陸侃如的「自我解剖」看，曾經親近胡適的經歷所造成的心理負擔仍是難以釋解的。他檢討說：

在口頭上批判胡適是容易的，但在思想上肅清胡適的毒素，並且在實際行動中貫徹下去，對於一個沒有得到好好改造的舊知識分子來說，那是需要一番堅決刻苦的鬥爭的。<sup>76</sup>

這也是陸侃如凡遇「運動」便積極批判胡適的原因。<sup>77</sup>

公認的胡適弟子之一的顧頡剛也參與了胡適「政治反動性」的建構，但和陸侃如積極主動地反戈一擊不同，顧頡剛是以更為被動的方式，頗為糾結和委屈的心態，批判胡適的。有關顧頡剛與胡適的關係，余英時先生已有過詳細的解讀，<sup>78</sup>在此僅僅補充一點他參與批判胡適時的複雜心態，特

<sup>76</sup> 以上均見陸侃如，〈紀念五四，批判胡適〉，《文史哲》，1952年第3期（青島，1952.05），頁3-6。

<sup>77</sup> 從《文史哲》雜誌1955年第1期刊登的幾篇1954年11月7日山東大學召開關於「紅樓夢」研究討論會的發言稿看，只有陸侃如最積極回應毛澤東的號召，直截了當地批判胡適。

<sup>78</sup> 余英時，〈未盡的才情——從《日記》看顧頡剛的內心世界〉，《顧頡剛日記》（臺

別是他微妙的思想轉變。這實際上構成了胡適「政治反動性」建構過程中的另一個圖景。

顧頡剛參與胡適思想批判是從 1951 年 12 月 2 日受邀參加了《大公報》在上海召集，由王芸生主持的「胡適思想批判座談會」開始的。到了會場顧頡剛才發現，參加座談會的人員中間只有他和胡適有直接關係。<sup>79</sup>

座談會召開前後的一些舉動最能反映顧頡剛緊張惶恐的心態。開會的當天，顧頡剛在日記裡寫道：「此會當是北京方面命開者，而我則為其提名，不容不到，故連日有電話來催迫。」<sup>80</sup>為了會議發言，顧頡剛提前三天做準備，11 月 30 日寫下 3,500 字的發言稿，第二天又加工到 4,000 多字。<sup>81</sup>但拿給友人看，友人說「分量不足」；開會前再拿給友人丹楓(即章巽)看，後者說：「講以前胡適有進步作用，固是事實，但不能講。」勸顧「不必用書面方式」，並「代擬一綱要」。顧頡剛感嘆道：「蓋至於今日而真話說不得矣。」<sup>82</sup>

不講真話並不等於獲得「沉默的自由」，在批判胡適時，沒有哪位舊知識分子享受不公開表態的豁免權。無論是真是假，在座談會上的發言畢竟是顧頡剛「第一次在公開場合批評胡適，說『胡適是政治上的敵人，也是思想上的敵人。』」<sup>83</sup>從他 12 月 6 日反復修改，且重寫即將發表在《大公報》上的座談會筆記稿，又「到丹楓處，作最後之審定」，才赴大公報館送稿的周折，也可見其重視的程度。<sup>84</sup>以後的幾天，他都在關注著事態的發展。12 月 16 日，「『胡適思想批判座談會』各文」在《大公報》上刊登，顧頡剛細讀後感嘆道：「恐怕以後再要作更深澈的討論。」

此處有兩個微妙變化，值得一提。12 月 3 日，顧頡剛讀《文匯報》發現，北大批判胡適時，有人說傅斯年、羅家倫、楊振聲和他自己是胡適的「四大金剛」。他在日記反駁道：「此話不知如何說起。羅與胡的關係極淺，

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7)第1卷，〈代序〉，頁17-37。

<sup>79</sup> 詳見顧頡剛，《顧頡剛日記》第7卷，頁143，1951年12月2日日記。

<sup>80</sup> 顧頡剛，《顧頡剛日記》第7卷，頁143，1951年12月2日日記。

<sup>81</sup> 參見顧頡剛，《顧頡剛日記》第7卷，頁141-142，1951年11月30日及12月1日日記。

<sup>82</sup> 見顧頡剛，《顧頡剛日記》第7卷，頁143，1951年12月2日日記。

<sup>83</sup> 參見顧潮，《歷劫終教志不悛——我的父親顧頡剛》(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頁246-247。

<sup>84</sup> 顧頡剛，《顧頡剛日記》第7卷，頁144-145，1951年12月3日日記。

我則早已疏遠了。」<sup>85</sup>這表明在第一次公開批判胡適的一天後，顧頡剛就決意與胡適徹底劃清界限了。雖然從胡、顧的交往史看，到 1920 年代中期，他與胡適觀點出現分歧，隨後兩人的來往確實沒有早年那麼密切，但他們的聯繫一直保持到 1949 年。因此，顧頡剛日記的說法顯然不是在講歷史，而是出於政治壓力下本能性地避禍。但這個或許是朦朧的意識，卻不僅成了顧頡剛後半生極力與胡適切割的起點，也讓他走上了根據政治需要書寫個人與胡適交往史的不歸路。

1979-1980 年間，87 歲高齡的顧頡剛曾寫下〈我是怎樣寫《古史辨》的？(上、下)〉，其中有關何時與胡適思想產生分歧又有新說，即不是原來所說的 1926 年，而是 1929 年；學術上的公開分歧，則以 1932 年 6 月 30 日發表在《史學年報》第 1 卷第 4 期上〈從《呂氏春秋》推測《老子》之成書年代〉為標誌。更有意思的是，他不僅重申了 1954 年 12 月在政協會議上發言時所言，而是進一步以自己 1920 年代的日記證明，他確實一直都崇拜王國維，且直接受錢玄同而非胡適的影響。<sup>86</sup>

政治批判運動或思想改造運動的有形效應很容易被發現，但無形的影響，卻常常被忽視。顧頡剛從最初的一個閃念到晚年自覺地以日記為依據與胡適切割，進而塑造個人歷史和學術傳承的「新譜系」就是這種無形影響的結果。不僅是顧頡剛，陸侃如到晚年也堅持認為，自己對胡適並非亦步亦趨，所以未必受其影響。<sup>87</sup>這當然可以歸因於政治的壓力。但換個視角

<sup>85</sup> 顧頡剛，《顧頡剛日記》第 7 卷，頁 143，1951 年 12 月 3 日日記。

<sup>86</sup> 參見顧頡剛，〈我是怎樣寫《古史辨》的？(下)〉，收入中國哲學編輯部編，《中國哲學》(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1)第 6 輯，頁 387-400。需要說明的是，1979-1981 年間，大陸的政治氣候雖較以往稍有寬鬆，但胡適及相關研究仍屬「險學」，與胡適相關的文章基本都是在小心翼翼地拔亂反正，重估地位，而第一部胡適研究的著作——耿雲志先生《胡適研究論稿》——要到 1985 年才由西南一隅的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1980 年，對政治運動心存顧慮的顧頡剛是帶著顧慮辭世的。

<sup>87</sup> 陸侃如晚年自述：「過去批判胡適時，說我是胡適信徒，說我受胡適『整理國故』影響，企圖引導青年脫離現實鬥爭等等，這是不很符合事實的」、「我當時的確很尊敬胡適，他是大名人，但我絕不盲從。這從我發表的許多批評他的文章即可看出。」參見龔克昌整理，〈陸侃如自述〉，收入國務院學位委員會辦公室編，《中國社會科學家自述》(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頁 584。但陸侃如 1979 年即去世，他晚年應與顧頡剛一樣，是心存顧慮的。

看，政治批判運動或思想改造運動的愈演愈烈，最容易觸及到受批判者的底線和自尊。他們的觸底反彈更多地是出於人性的本能，這個反彈可能是正向的，即不承認錯誤；也可能是反向的，承認錯誤的同時，也在努力證明自己的不錯誤。顧頡剛最初根本不承認自己是胡適的「四大金剛」，認為不合乎歷史；晚年更證明自己的學術與胡適無關，無非是想說明自己的不錯誤。而辯解得久了，連他自己也產生了「假作真時真亦假」的幻象。吊詭的是，這種極力與胡適劃清界限，卻正是中共政治批判或思想改造所要達到的目標。從這個意義上說，他和陸侃如既是中共建構胡適政治反動性和政治化「五四」的產物，又不幸成了一種輔助性建構的力量。

顧頡剛的另一個微妙變化是在三年後。1954年12月24日，也即在「胡適思想批判」運動開始以後，他要在政協第二屆全國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發言。比上次的謹慎猶有過之的是，此次的發言稿，經十位友人修改，歷時七天方定稿，實在可算是「集體智慧的結晶」。即使如此，顧頡剛仍倍感政治壓力下發言的「大不易」。<sup>88</sup>但遍觀顧頡剛的發言，他已經學會用當時流行的政治話語批判胡適了。他說，胡適的「所謂研究方法乃是腐朽的資產階級唯心論的方法，他的一切學術工作乃是替封建勢力和美帝國主義服務、轉移青年目標、進行反革命活動的手段。」<sup>89</sup>

總體上看，到1955年3月「胡適思想批判」運動告一段落，胡適「政治反動性」的建構才得以完成。此前，1954年12月8日，在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主席團和中國作家協會主席團召開的聯席擴大會議上，作為「胡適思想批判」運動的直接領導人，中國科學院院長、中國文聯主席郭沫若的動員講話只是為運動定了調子。他說：

中國近三十年來，資產階級唯心論的代表人物就是胡適，這是一般所公認的。胡適在解放前曾經被人稱為「聖人」，稱為「當今孔子」。他受著美帝國主義的扶植，成為買辦資產階級第一號的代言人。他由學術界、教育界而政界，他和蔣介石兩人一文一武，難弟難兄，

<sup>88</sup> 參見顧頡剛，《顧頡剛日記》第7卷，頁629，1954年12月23日日記。

<sup>89</sup> 具體見〈在中国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二屆全國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上的發言(之二)——顧頡剛委員的發言〉，《人民日報》(北京)，1954年12月25日，3版。

倒真是有點像「兩峰對峙，雙水分流」。<sup>90</sup>

到 1955 年 3 月，「胡適思想批判」運動的另一直接領導者，中國科學院社會科學部副主任兼哲學研究所所長潘梓年有關運動的總結，則標誌著胡適「政治反動性」建構的最終完成。

1949 年前，潘梓年曾任《新華日報》社社長，他先後於 1938 年 5 月 4 日、1939 年 1 月 19 日和 1940 年 5 月 4 日分別發表過〈繼承「五四」的光榮傳統〉、〈發揮「五四」運動所提倡的科學精神〉以及〈繼承五四的革命傳統開展新民主主義的文化〉三篇文章。其中〈繼承「五四」的光榮傳統〉中曾引用胡適的話贊吳虞是「隻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sup>91</sup>但他在題為〈徹底批判胡適派資產階級唯心主義思想是貫徹祖國過渡時期任務的一個嚴重問題〉的總結報告中說：

胡適從『五四』運動起一直到解放戰爭勝利，一直到現在，一直充當著站在反動統治方面來使我們思想上的局限性僵化起來的文化班頭，以此為反動統治服務，毒害人民的文化事業，毒害人民的科學事業。

更主要的是因為胡適站在統治階級的地位，是反動統治者的御用學者，美帝國主義的文化走狗，背後有帝國主義和蔣介石反動統治集團撐腰，是舊中國在文化上、思想上的統治者。<sup>92</sup>

潘梓年對胡適「政治反動性」的定性已經讓胡適不可能再與政治化或者說神聖化的「五四」發生任何正面意義上的關聯了。

#### 四、有關胡適治學方法的否定和爭議

儘管在政策層面，胡適的「政治反動性」已確定無疑，可在許多舊知識分子那裡，這些政治標籤仍不具有說服力，特別是全盤否定胡適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的地位和作用，讓他們一時無法接受。然而，在毛澤東以及

<sup>90</sup> 參見郭沫若，〈三點建議〉，《人民日報》（北京），1954年12月9日，1版。

<sup>91</sup> 參見《新華日報》（延安），1938年5月4日，1版。

<sup>92</sup> 以上均見潘梓年，〈徹底批判胡適派資產階級唯心主義思想是貫徹祖國過渡時期總任務的一個嚴重問題〉，《科學通報》，1955年4月號（北京，1955.04），頁4。

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主席團和中國作家協會主席團等「胡適思想批判」運動的實際執行機構的負責人看來，不否定胡適五四領導者的地位，就不足以樹立「五四」的純潔性，更無法證明毛澤東「五四」是「新民主主義開端」的論斷的正確性。

否定胡適「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領袖地位這個超歷史的政治認定起初所以不能完全說服接受思想改造和參與「胡適思想批判」運動的舊知識分子，是因為他們中的不少人就是那些當年「五四」的參加者，否定胡適及其學術，就等於是否定自身的歷史價值和學術貢獻。這一點在有關考據學價值的爭議中，顯得特別突出。

### (一)政治掩飾下的學術分歧：有關考據學的爭議

考據學及其方法雖不源自五四時代，但胡適提倡的科學的考據學方法(即「新考據學」)卻是新文化運動的產物，它所以受到批判，主要是因為提倡者乃胡適。這裡體現的是毛澤東「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式的思維。<sup>93</sup>當然，新考據學內涵的「為學術而學術」的精神，在政治掛帥的時代也必然成為批判的對象。1955年5月，「胡適思想批判」運動告一段落後，中共中央宣傳部還在總結文件中將胡適的治學方法和治學態度說成是「胡適思想中欺騙性最大、迷人最深、影響最廣」的部分，要求「進一步組織文章，進行深入分析和批判。」<sup>94</sup>

「胡適思想批判」運動過程中對考據學方法的批判有兩種情況。一種是純粹政治性的批判，另一種實際是學術分歧引起，在政治批判的掩飾下展現的。

在純粹政治性批判者的心目中有一個政治化「五四」的預設，這個預

<sup>93</sup> 毛澤東的原話是：「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參見〈毛澤東先生與中央社記者劉先生、掃蕩報記者耿先生、新民報記者張先生的談話(九月十六日下午六時在延安)〉，《解放》，第86期(延安，1939.10.10)，頁9。

<sup>94</sup> 參見〈中央宣傳部關於胡適思想批判運動的情況和今後工作的報告〉，收入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黨史黨建政工教研室編，《中共黨史參考資料》(北京：國防大學出版社，1986)第20冊，頁565。

設的政治標準自然是由毛澤東和上級領導來確定，而毛澤東的態度往往捉摸不定，需要細加揣測；具體負責執行的高層領導的態度，也隨時變化。在無法吃透上面精神的情況下，即使是代表官方發言，其說法也會前後不一。

王若水其時是《人民日報》理論部的評論員，「胡適思想批判」運動的第一篇文章，即刊登於 1954 年 11 月 5 日《人民日報》上的〈清除胡適的反動哲學遺毒〉，正是出自他之手。<sup>95</sup>在批判胡適提倡的新考據學時，他就先後提供了兩個觀點相互抵牾的版本。

在〈清除胡適的反動哲學遺毒〉一文裡，王若水說胡適是熱衷於政治的，但是要偽裝「清高」，故希望學術家不要過問政治，只埋頭於所謂「學術」的研究中。<sup>96</sup>可一個多月後，在〈五四運動中的胡適與杜威〉中，王若水又認為，胡適的大錯是「不談政治」，而蘇俄十月革命和李大釗都在「講政治」。他說，作為「五四」運動右翼的代表，胡適拼命想把「五四」運動限制在單純反對文言文和某些封建文化等狹隘範圍內，拼命想使「五四」運動不超出對他所代表的階級有利的範圍以外。<sup>97</sup>當然，政治批判的矛盾，又是可以通過政治方式來解決的。因為無論胡適是談政治，還是不談政治，都是別有用心，原因只有一個，即「站在反動立場上」。按照王若水的說法：

不管誰怎樣標榜「科學的方法」、「歷史的態度」，只要他是站在反動立場上，只要他是想阻礙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他就一定不能客觀，他就一定要進行欺騙。<sup>98</sup>

<sup>95</sup> 後來王若水回憶說，他撰寫此文純粹是為了完成領導下達的任務。王若水，〈壓制思想的思想運動——讀李洪林的《中國思想運動史》〉，《當代中國研究》，2000 年第 3 期（紐澤西，2000.04），參見 <http://www.modernchinastudies.org/us/issues/past-issues/70-mcs-2000-issue-3/545-2012-01-03-12-11-40.html>。但他的兩篇批判文章斷章取義，唯我獨尊，終成了最讓胡適不「適」的文本。1954 年 12 月 21 日，胡適讀到王若水文章最後一段「胡適……的『學術思想』，他的實驗主義哲學卻還影響著學術界。他的幽靈還附在俞平伯和其他一部分文化界人士的身上」後感嘆道：「我讀了毛骨悚然！這幾個字可以陷害多少人，可以清算多少人！」見胡適致沈怡信，收入《胡適全集》第 25 卷，頁 619。

<sup>96</sup> 參見王若水，〈清除胡適的反動哲學遺毒〉，《人民日報》（北京），1954 年 11 月 5 日，3 版。

<sup>97</sup> 王若水，〈五四運動中的胡適與杜威〉，《人民日報》（北京），1954 年 12 月 28 日，3 版。

<sup>98</sup> 參見王若水，〈清除胡適的反動哲學遺毒〉，3 版。

另一種情況，即政治掩飾下學術分歧引起的爭議，則相對隱晦和複雜。因為在泛政治化的時代，自居於政治之外是無法讓人容忍的，而政治參與雖是獲得生存權的必要條件，但其正確與否卻取決於「政治立場」。將胡適描述成「脫離政治」，提倡所謂「純學術」，讓「學術脫離政治」的不僅是政治人物，學者們也鸚鵡學舌，作相似的表態。就學術背景看，這些學者也分為兩種。一種是原本以考據方法治學者的批判，因而摻雜著考據學內部的分歧；另一種則是偏重義理的哲學學者及「史觀派」歷史學者借機傾訴不滿。

范文瀾曾在北大受教於以小學見長的黃侃，早年也以考據著稱，但他說：所謂「純學術」，含義就是做考據工夫，它的前身是乾嘉考據學。……胡適繼承舊文化的最壞部分，再加上販運來的「科學的方法」，這就出現了胡適派的「純學術」。<sup>99</sup>

范文瀾後來接受馬克思主義，他的說法出於政治立場，尚有可原。而高亨和童書業都是純粹的考據派學者，他們也追隨政治時尚，出面否定考據學的價值，則表明了政治脅迫的力度之大。

高亨是北大出身，後入清華研究院師從王國維和梁啟超。他不僅指責胡適的「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反科學」，而且說，胡適提倡的「尊重事實，尊重證據」也是「反科學」的。他送了胡適二十四個字：「主觀假設，片面求證，只會大膽，沒有小心，玩弄事實，玩弄證據。」他還舉出四個實例，具體證明胡適在考據上的「不科學」。<sup>100</sup>童書業是顧頡剛一手提攜的「古史辨」派健將，但他寫道：「考據的方法，決不能探求著歷史的本質和規律，它更沒有批判歷史的能力。」他不僅認為「古史辨」派的「默證」方法「不科學」，甚至誇張地說「胡適派的『考據學』事實上要比康有為的今文經學還要武斷。」<sup>101</sup>

偏重義理的哲學學者及「史觀派」歷史學者本來就對考據派及其方法

<sup>99</sup> 范文瀾，〈看看胡適的「歷史的態度」和「科學的方法」〉，《歷史研究》，1955年第3期(北京，1955.05)，頁28。

<sup>100</sup> 參見高亨，〈批判胡適的考據方法〉，《文史哲》，第5期(青島，1955.09)，頁33-38。

<sup>101</sup> 見童書業，〈批判胡適的實驗主義「考據學」〉，《光明日報》(北京)，1955年2月3日，3版。



不滿，現在正好可以利用政治運動來挾帶私見。如推崇朱熹的「新心學」代表、哲學家賀麟就為朱子叫屈，<sup>102</sup>且直言考據是「假借注重科學和科學方法，以反對哲學，實際上是在玩弄鑽牛角尖的瑣屑破碎的」方法。<sup>103</sup>歷史學家趙儷生雖從考據起步，且曾受胡適重視，<sup>104</sup>1949年後則執著於建立「新史觀」，他從胡適考據方法中讀出的，與其說是「史觀派」對於新考據方法的偏見，不如說是對胡適學術研究方法的一種蔑視。<sup>105</sup>

以上兩部分人批判胡適考據學方法的同時，也徹底否定考據學的學術意義和存在價值，這既觸動了顧頡剛的底線，也讓陸侃如頗感不安。陸侃如研究楚辭以及中國古代詩史均以考據見長，他所強調的「歷史眼光」，也是受胡適影響的證據。批判胡適的過程中，「歷史癖」與「考據癖」成了他檢討自己，批判胡適的關鍵詞。「胡適思想批判」運動開始後，他仍深感過去所受胡適這兩方面的影響「剷除不盡」，不得不以此作為自我批判的突破口。他說，胡適所以「強調『歷史癖』與『考據癖』，也就是因為這對於反動統治有用，而我們就盲目地走進他的圈套裡。」不過，他還是提到：

當然我們不能籠統地反對考據，不應該抹煞科學的考據在研究工作中的用處，相反地我們應該承認考據和訓詁、校勘同樣研究古典文學必要的準備工作之一。<sup>106</sup>

相對陸侃如的謹小慎微，顧頡剛的反彈更激烈一些。1955年初，他就

<sup>102</sup> 參見賀麟，〈批判胡適的思想方法〉，《新建設》，1955年3月號(北京，1955.03)，頁22-23。此文收入《胡適思想批判(論文集編)》(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55)第4輯時有修改。

<sup>103</sup> 賀麟，〈兩點批判，一點反省〉，《人民日報》(北京)，1955年1月19日，3版。

<sup>104</sup> 據趙儷生夫人高昭一回憶，趙的「第一篇史學論文《清初山陝學者交遊事蹟考》一文，發表於《大公報》胡適主編的《文史週刊》上，此文受到胡(按，胡適)先生讚賞，還親自寫了一信給儷生，鼓勵作者繼續努力。」見《回首憶當年》，收入趙儷生、高昭一，《趙儷生高昭一夫婦回憶錄》，頁283。

<sup>105</sup> 見趙儷生，〈批判胡適反動的考據方法和校勘方法〉，《文史哲》，1955年第5期(青島，1955.09)，頁38-41。1979年大陸改革開放後，趙儷生又寫過文章，對其觀點，進行了修正，有條件地肯定了胡適考據方法的價值。具體參見其〈胡適歷史考證方法的分析〉，《學術月刊》，1979年第11期(上海，1979.11)，頁42-46。

<sup>106</sup> 參見陸侃如，〈胡適反動思想給予古典文學研究工作毒害〉。此文先後刊登在1954年第21號《文藝報》和《文史哲》1955年第1期上，現據《文史哲》，1955年第1期(青島，1955.01)，頁1。

有意為考據學辯護，如在 2 月 28 日所寫的〈《古籍考辨叢刊》序〉中，顧頡剛說：

「考據學」是一門中國土生土長的學問。……到了現在，考據學這個名詞應當改稱「史料學」。史料學的目的，是從資料的來源和它的真確性以及作者的時代和他的環境等等問題來揭示出每一件資料的本質，認識它是一定社會環境下的產物。<sup>107</sup>

這實際上是要說明，考據學(或史料學)並無批判者所謂的「階級性」。然而，這個闡明考據學價值的聲音很快被湮沒在批判的聲浪之中，顯然增添了顧頡剛的不滿。1955 年 3 月 5 日，顧頡剛要在中國科學院「胡適思想批判」歷史組會議上發言，在日記裡他所說的「近來批判胡適歷史學、考據學的文字中，常常牽到我和《古史辨》，因此，我在今天會上說個明白」，<sup>108</sup>正表現出了一副與人爭訟的架勢。會場上的更多細節，被顧頡剛記錄在同年 5 月所記之〈義理、考證、詞章三學〉中。他寫道：

1955 年，科學院發動胡適批判，其一組為考據學，主之者以阮刻《經解》為考據學之總匯也，取而翻之，渺無所得，為之廢然，此組之會遂不能續開。當初開會時，予曰：「我欲為考據學說一公道話，考據學是反封建的。」聞者大嘩，對予抨擊，以為考據學惟為封建統治服務。不知封建統治者但便私圖，或改古文，或易本義，而考據學之目的在求真，縱從事者無反封建之主願望，而工作之客觀效果必使封建統治者之所竊改塗附盡歸掃蕩。只恨考據大家曾不能將此工作理論化，遂使一般人無從認識其意義耳。<sup>109</sup>

<sup>107</sup> 參見顧潮編著，《顧頡剛年譜(增訂本)》(北京：中華書局，2011)，頁415。

<sup>108</sup> 見顧頡剛，《顧頡剛日記》第7卷，頁663，1955年3月5日日記。

<sup>109</sup> 參見顧頡剛，〈義理、考證、詞章三學〉，《顧頡剛讀書筆記(古柯庭瑣記之二)》第6卷(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0)，頁4162-4163。此段之前，顧頡剛有按語道：「昔人所謂義理，即今所謂理論也；所謂考據，即今所謂資料研究也；所謂詞章，即今所謂表現之技巧也。有理論，然後有宗旨，有選擇，有批判。有資料研究，然後能把握實際之事物，使理論結合實際，不為空言。有表現之技巧，然後能吸引人之視聽，使其易於理解。三者實一事也，而以個人才性所偏，不得不析為三。清代漢學家不瞭此義，己不能為理論，又排斥他人之理論，遂使己所研究之資料盡陷於孤立而脫離實際；又不作總結，使人無從見其工作之路線與此一園地中工作之全貌。又文辭枯燥蹇澀，又不斷句、分段，使人不能讀，讀之亦不終卷而思臥。以此，用

但顧頡剛的「良好願望」，在思想改造或政治運動的語境下，恰是他政治上「反動」的證明。因為「胡適思想批判」運動中對胡適考據學的批判純粹是政治性的，牽涉到所謂「政治立場」問題。顧頡剛為考據學辯護，其實不僅間接地衛護了胡適在五四時代的學術地位，且讓他自述的1926年前受胡適之影響得到了確證。這不僅是「聞者大嘩」的原因，也與他個人努力劃清與胡適界限的初衷相睽違。

顧頡剛所承受的心理壓力在其日記中亦有反映。發言的當天，他記錄說：「今日發言後精神緊張，失眠，服藥。」以後的幾天，他仍在關注報刊上批判胡適的文章，且為批判需要閱讀《胡適文選》，但因家庭瑣事，「又在胡適批判會中發言太老實，為人所不滿，連日服藥而眠。」3月15日他被迫「作檢討書，自認錯誤。」<sup>110</sup>到3月26日在中共統戰部開胡適思想批判會，「受尖銳激烈之批判」後，<sup>111</sup>顧頡剛甚至有了學術生涯即將終止的擔憂。<sup>112</sup>

當然，有關考據學的爭議只是「胡適思想批判」運動中的一個插曲，並不能改變政治上否定胡適以及重新塑造「五四」歷史的大趨勢。相反，爭議過程中，那些因學術分歧而貶斥考據學價值及胡適方法論的學者，卻成了政治運動輔助性的助推力量。因為他們給純粹的思想改造或政治運動塗上的學術色彩，也讓思想改造或政治運動顯得合乎理性。這種既被改造，又改造他人的雙重角色，正體現了毛澤東主導的思想改造或政治批判運動

---

力雖勤，收效實寡，人但見其相率而入於無用之途而已。」可見，顧頡剛自認所秉持的「新考據學」，不同於乾嘉考據，亦不認為自己只有考據一法。有關考據學「反封建」的意思，在顧頡剛看來，乃自己的一大發現。在同年8月31日的日記中，他也提到：「考辨工作者其主觀願望為尊重孔子，而客觀效果為破壞經學，並打擊孔子之地位，亦即反封建運動，皆未經人道過者。」顧頡剛，《顧頡剛日記》第7卷，頁733。

<sup>110</sup> 以上分別見顧頡剛，《顧頡剛日記》第7卷，頁663-666，1955年3月5日、3月8日、3月11日、3月15日日記。

<sup>111</sup> 參見顧潮編著，《顧頡剛年譜(增訂本)》，頁417。

<sup>112</sup> 顧頡剛在1955年3月31日的日記中說：「《秦漢方士與儒生》，今出版矣。看輿論如何，如多抨擊，則予寫作生涯其將擱筆矣乎？」顧頡剛，《顧頡剛日記》第7卷，頁671。施耐德(L. A. Schneider)注意到，「顧頡剛未曾參與50年代舉行過多次的中國歷史討論會。」參見施耐德著，梅寅生譯，《顧頡剛與中國新史學》(*Ku Chieh-Kang and China's New History*)(臺北：華世出版社，1984)，頁348。

下知識分子的基本境遇。

然而，「胡適思想批判」運動始終是一場思想改造及政治批判運動。就在學者為考據學爭議不休，大有走極端的傾向時，那些有較高職位、較深政治資歷的中共理論家、歷史學家便出面充當緩衝器，以使運動盡在掌控之中。比如時任北京大學副校長的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翦伯贊就說：「不管胡適的歷史知識如何淺薄，他還是有他一套，否則他就不能嘩眾取寵、欺世盜名，橫行中國學術界達三十幾年之久。」<sup>113</sup>時任武漢大學校長的李達也認為，胡適「五四」前還是進步的，但「五四」後就反動了。<sup>114</sup>

與考據相關的另一問題——「為學術而學術」，因為涉及政治立場和政治態度，也同樣受到批判。與胡適有直接關係的學者在檢討和批判胡適思想時大多聲稱胡適「反動思想」的表現是遠離政治，「為學術而學術」。因為他們揭發胡適的「為學術而學術」是為了兼顧著進行自我批判。胡適的私淑弟子、歷史學家羅爾綱就說，胡適教我寫歷史必須超政治階級，站在「客觀」的立場，不偏不倚，方配做歷史家。<sup>115</sup>考古學家夏鼐則認為，胡適「『整理國故』不過是想引導知識分子脫離革命的隊伍。」<sup>116</sup>

但一些與胡適關係相對較遠的舊知識分子，出於政治需要，則毫不客氣地指責胡適提倡「為學術而學術」是「別有用心」或「假清高」。北京師範大學教授白壽彝就說，胡適的「為學術而學術」或「為真理而真理」根本不是真的，是「裝扮的『超階級』的模樣」，目的是為「外國帝國主義及其在中國境內的走狗的利益」服務的。<sup>117</sup>不過，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後，白壽彝自己也在劫難逃。提攜白氏多年的顧頡剛的品評，頗能顯示白氏的

<sup>113</sup> 參見〈批判胡適主觀唯心論的歷史觀與方法論——北京大學歷史系教師座談會發言摘要〉，《光明日報》（北京），1955年1月6日，3版。

<sup>114</sup> 李達，〈胡適的政治思想批判〉，《人民日報》（北京），1954年12月31日，3版。

<sup>115</sup> 羅爾綱，〈兩個人生〉，《光明日報》（北京），1955年1月4日，第3版。羅爾綱曾作過胡適的家庭教師，也是胡適最親近的幾位弟子之一。參見羅爾綱著，《師門五年記·胡適瑣記（增補本）》（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

<sup>116</sup> 夏鼐，〈批判考古學中的胡適資產階級思想〉，《考古通訊》，1955年第3期（北京：1955.05），頁5。據夏鼐日記說，此文僅寫了不到兩日。參見《夏鼐日記》（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第5卷，頁145。有關此文，以後日記未再提及。

<sup>117</sup> 白壽彝，〈胡適對待祖國歷史的奴才思想〉，《新建設》，1955年4月號（北京，1955.04），頁13。

為人。他寫道：

聞白壽彝在北京師大亦已被定為「三反分子」。此人在解放前靠我周濟渡日，垂二十年，解放後即若不相識。以拍陳垣，得任師大歷史系主任。以拍尹達，得為歷史所兼任研究員。以回民故，得為全國人大代表。以拍吳晗，得為「歷史小叢書」編輯委員。<sup>118</sup>

應該說，政治運動促使人性惡化，也讓人性之惡暴露無遺。

在「胡適思想批判」運動中，與胡適階級立場迥異，原本即是左翼學者或來自解放區的中共理論家似乎已經學會了「透過現象看本質」，他們認為胡適就只有「政治反動性」。馬克思主義理論家、中共中央學校教授孫定國說：

胡適不是一個為學術而學術的人，胡適不是一個超黨派的「高等華人」。恰恰相反，胡適是一個在中國學術界長期地披著「革命」與「科學」的外衣，積極宣傳資產階級的改良主義的反動學閥和政客。<sup>119</sup> 這個說法也得到東北師範大學教育系主任陳元暉等人的贊同。陳元暉以胡適所說「我們當日不談政治，正是要想從思想文藝方面替中國政治建築一個非政治的基礎」為據判斷說，胡適從事「學術」研究都是「為了政治目的的。」<sup>120</sup>比較有意思的是文藝理論家、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教授黃藥眠。在他眼里，胡適的「反動性」是有意抹煞文學作品的「社會內容、政治內容」：

企圖取消新文學的進步意義而代替以形式主義；一開始就販賣著帝國主義的有毒的文學思想，一開始就在那裡散佈奴隸思想，準備向封建主義投降。<sup>121</sup>

<sup>118</sup> 參見顧頡剛，《顧頡剛日記》第10卷，頁506-507，1966年8月5日日記。

<sup>119</sup> 孫定國，〈批判胡適哲學思想的反動實質〉，全文分三次刊於1954年12月15日、29日及1955年1月12日的《光明日報》上，後另添〈關於「真理論」和「實在論」的批判〉（原題〈批判實驗主義對「真理」和「實在」的觀點〉，刊《人民日報》，1955年2月23日，3版，收入時有增減）及〈結論〉，輯成《胡適哲學思想反動實質的批判》（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一書。此處據《胡適思想批判（論文彙編）》第1輯，頁143。

<sup>120</sup> 陳元暉，〈肅清學術研究中實用主義方法論的毒害〉，《新建設》，1954年12月號（北京，1954.12），頁8，又見《胡適思想批判（論文彙編）》第1輯，頁102。

<sup>121</sup> 黃藥眠，〈胡適的反動文學思想批判〉，《新建設》，1955年4月號（北京，1955.04），頁4，又見《胡適思想批判（論文彙編）》第5輯，頁176。

當然，在 1949 年後，知識分子思想改造和「胡適思想批判」運動中，與胡適曾有聯系的學者，也不全像陸侃如一樣對胡適反戈一擊。其中如社會學家、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吳景超和政治學家、南京大學教授高一涵，不論發言，還是寫文章，都是言不及義或王顧左右而言他。<sup>122</sup>1955 年，在北京大學歷史系教師座談會上，歷史學家向達只檢討自己的問題，他也不想太涉及胡適。<sup>123</sup>這期間，自然也有斗膽提出異議者。在中山大學的教師座談會上，古文學學家、中文系教授容庚不僅反對批判胡適，而且要求把自己在座談會上為胡適辯護的話刊登在中山大學的校刊上。<sup>124</sup>歷史學家陳寅恪倒沒有直接論及胡適的地位，而是表態說：「人人都罵俞平伯，我不同意。過去你們都看過他的文章，並沒有發言，今天你們都做了共產黨的應聲蟲，正所謂『一犬吠影，百犬吠聲。』」<sup>125</sup>可是，這些零星的異見，並不能改變「胡適思想批判」運動整體上愈演愈烈的趨勢。

## (二) 喪失斯文：政治批判運動中的扭曲現象

在政治運動中，受批判的知識分子往往隨著政治批判的力度加大而斯文掃地，反過來看，身為批判者的知識分子為加大批判力度，同樣喪失斯文。馬克思主義思想史家侯外廬是以作學問的方式批判胡適的，他查閱了胡適遺留在北京的私人檔案、書信和遺稿，並逐一編號，以利自己引用；所作〈揭露美帝國主義奴才胡適的反動面貌〉，正文計 5 萬餘字，注釋 109 條(據修改稿統計)。但在言語上，侯外廬卻最為尖刻。他與嵇文甫等人的譏

<sup>122</sup> 吳景超在〈我與胡適——從朋友到敵人〉中除了政治性地表態外，只是在羅列一些與胡適交往的瑣事。參見《光明日報》(北京)，1955年2月8日，3版。而高一涵的〈實用主義的政治思想的反動本質〉既未顯示其政治學的專業水準，且將批判的重點放在杜威實用(驗)主義上，胡適大名則很少提及，這是明顯的避重就輕。參見《新華日報》(南京)，1955年2月27日，3版。

<sup>123</sup> 具體見向達發言，〈批判胡適主觀唯心論的歷史觀與方法論——北京大學歷史系教師座談會發言摘要〉，《光明日報》(北京)，1955年1月6日，3版。

<sup>124</sup> 參見〈中央宣傳部關於胡適思想批判運動的情況和今後工作的報告〉，頁563。

<sup>125</sup> 參見潘國維，〈中山大學的部分教授對關於「紅樓夢研究」問題的討論抱著抗拒態度〉，原刊新華社參考消息組編，《內部參考》，1954年第282期，頁141，轉引自謝泳，〈胡適思想批判與《胡適思想批判參考資料》〉，頁49。

諷謔罵式文風直追始作俑者郭沫若。

侯外廬說：

胡適永遠說等五年、十年或五十年，期待著「中美待嫁」，買賣成交，同時永遠一點一滴地投資，無時不以「現任媒婆」而自居，「東說說，西說說」，努力去「擺渡」。這就是胡適所反映的買辦資產階級經紀人的投資性質。

又說：

胡適長期用各式各樣的假面具，粉裝出「獨立」、「自由」、「改良」或「淑世」的「好人」，而在「緊要關頭」又「擺出紳士的醜架子」，賣弄「一代風騷」，迷惑觀聽。這就是胡適所反映的美帝國主義的「外國脾氣」同買辦資產階級的「長衫」行道混合起來的騙術。<sup>126</sup>

不過，侯外廬顯然對胡適擁有的學術地位印象深刻。他說胡適：

首先在「不談政治」方面打擊了過去學術界的權威如章太炎、蔡元培、梁啟超等，繼承了祖傳秘訣，使學術「路上的人都紛紛讓開一條路」，爬上「國際自由主義」的「學者」地位。<sup>127</sup>

以「左派王學」著稱的嵇文甫以前曾與胡適有過節，研究路向也與胡適不同。<sup>128</sup>在「胡適思想批判」運動中，他不止一次地用嘻笑怒罵式的言語嘲諷胡適。他說胡適：

講歷史就和講政治一樣，只能一個問題一個問題作些煩瑣無聊的考證，只追求表面現象，沒有能力解決歷史上的重大的關鍵性的問題。……胡適只會就思想論思想，就現象論現象，支離破碎，完全

<sup>126</sup> 侯外廬，〈揭露美帝國主義奴才胡適的反動面貌〉，《新建設》，1955年2月號（北京，1955.02），頁25-26，又收入《胡適思想批判（論文彙編）》第3輯，頁78-79。

<sup>127</sup> 侯外廬，〈揭露美帝國主義奴才胡適的反動面貌〉，此處據《胡適思想批判（論文彙編）》第3輯，頁19。按，收入《胡適思想批判（論文彙編）》第3輯時，侯外廬對此文進行了修改，此段即是新添加的。

<sup>128</sup> 嵇文甫1918年畢業於北京大學哲學系，1926年加入中共，1928-33年在北大任教，但後被解聘。參見《嵇文甫文集》（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上卷，〈前言〉，頁1-24。據時在北大哲學系任教的賀麟說，解聘嵇文甫是胡適的「哲學取消」論的具體表現，但此說並無依據，具體的原因有待考稽。參見賀麟，〈兩點批判，一點反省〉，3版。

表現出他沒有能力來解決關鍵性的重要問題。<sup>129</sup>

喪失斯文還表現在不顧史實，一味地迎合政治需要。山東大學教授鄭鶴聲研究的就是中國近代史，但他依舊說：

說到「五四」運動，向來有一種錯覺，好像這個運動，是由胡適他們領導起來似的。其實這時胡適在上海大張旗鼓的歡迎杜威……

從 1918 年 11 月起，李大釗等開始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宣傳馬克思列寧主義——布爾什維克的觀點，他在 1918 年 10 月 15 日連續發表了「庶民的勝利」「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這樣兩篇著名的論文（按，原文如此）。

在「五四」運動以前，除「新青年」以外，為了開展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宣傳，李大釗等於 1918 年 12 月在北京創辦「每週評論」。在「問題與主義」之爭中，「李大釗代表中國馬克思主義者在 8 月間發表了『再論問題與主義』一文，嚴正駁斥了胡適的謬論，並表明了中國馬克思主義者所要走的道路。」<sup>130</sup>同樣的說法也出現在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陰法魯的〈胡適、杜威、羅素是怎樣開始破壞中國的新文化運動的？〉中。在陰法魯看來，李大釗不僅加入《新青年》使之充滿活力，而且單獨創辦了《每週評論》。他說，從李大釗成了《新青年》的編輯人以後，這個刊物上發表了不少的介紹馬克思主義的文章，討伐著敵人——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sup>131</sup>這裡顯然不只是用李大釗來替代胡適，而且也替代了新文化運動的另一領袖陳獨秀。

不過，由於「政治覺悟不高」，有的學者在批判胡適某一方面的思想時，也顧此失彼。武漢大學中文系教授劉綬松的〈批判胡適在「五四」文學革命運動中的改良主義思想〉雖然突出李大釗和魯迅，但是他卻認為，是李大釗介紹列寧主義思想，「領導了『五四』時期的新文化運動。」<sup>132</sup>這顯然

<sup>129</sup> 嵇文甫，〈胡適唯心論觀點在史學中的流毒〉，《新史學通訊》，1955年元月號（開封，1955.01），頁3-4。

<sup>130</sup> 以上均見鄭鶴聲，〈胡適四十年來反動政治思想的批判〉，《文史哲》，1955年第5期（青島，1955.09），頁10-11。

<sup>131</sup> 以上見陰法魯，〈胡適、杜威、羅素是怎樣開始破壞中國的新文化運動的？〉，《光明日報》（北京），1955年3月3日，3版。

<sup>132</sup> 劉綬松，〈批判胡適在「五四」文學革命運動中的改良主義思想〉，原刊《文藝報》，1955年第1、2號合刊（北京，1955.01030），收入《胡適思想批判（論文彙編）》第2輯，



是沒有深刻領會毛澤東的指示精神，因為毛把「五四」學生運動作為劃分新、舊民主主義革命的分界線以後，「五四」前的新文化運動只能是資產階級運動，談何列寧主義思想「領導」新文化運動呢？

## 五、新文化運動核心要素的批判性消解

1949年以後，新文化運動思想上的核心要素，像「科學」、「民主」被政治化地吸收進入「五四」政治話語中，成了一種純粹政治化的口號；實用(驗)主義則因有美國背景而被唾棄和批判；而「個人主義」和「世界主義」則由於與中共政策的不合拍，被批判性地消解。有關「科學」、「民主」在1949年以後的政治化過程較為繁複，將另文討論。實用(驗)主義的批判前面已涉及較多，故亦省略。下面謹就以往注意相對較少的「個人主義」和「世界主義」等兩個核心要素的批判性消解，作一簡要詮釋。

### (一)「自私自利、個人英雄主義」：

#### 個人主義的政治化理解及其淵源

從理論上說，共產主義、社會主義所提倡的集體主義與資本主義所遵循的個人主義是天生的一對矛盾體。不過，在中共歷史上，對集體主義理解的極端和對個人主義理解上的片面，加之像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出於內部鬥爭的策略考量，以及具體的國內外時勢的影響，讓集體主義與個人主義之間的衝突顯得更為激烈。

毛澤東學生時代對「個人主義」的理解主要借助於宋明理學，拘泥於道德層面，<sup>133</sup>至1920年代，毛澤東開始批評「個人主義」，但他所理解的「個人主義」與西方的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並沒有直接的關係。他是在提倡「集體至上」的同時，將與中共黨的集體利益不協調的表現，通稱為「個

---

頁299。

<sup>133</sup> 參見蔡樂蘇，〈《毛澤東早期文稿》中幾個關鍵詞語釋義〉，《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3年第6期(北京，1993.11)，頁37-40。

人主義」。<sup>134</sup>實際上體現出的，一是軍事集權化的特徵，即軍隊的絕對服從黨的領導；二是將個人主義庸俗化地理解為個人利益不顧一切，從而成為個人道德缺失的代名詞。

1939年，另一個中共領導人劉少奇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也基本延續了毛澤東從消極層面理解個人主義的特點。在劉看來，「個人主義」的問題是「自私自利」、「個人英雄主義」。劉少奇對自由主義的理解，也與毛澤東〈反對自由主義〉裡一樣，<sup>135</sup>都與西方意義上的自由主義(Liberalism)無關，而主要與自由散漫，不聽指揮以及「個人主義」的幾種表現有關。這是為了強調「黨員的利益要服從黨的利益，為了黨的利益，還要求黨員在必要的時候犧牲黨員個人的利益。」<sup>136</sup>毛、劉的認知也成為以後中共批判「個人主義」的政治標準。

1940年代中葉，一方面是中國知識分子的美國觀在發生變化，<sup>137</sup>另一方面，自從1946年6月內戰爆發，美國援助國民黨後，中共與美國便處於對立狀態。毛澤東以新華社評論員名義連續發表了幾篇時評，抨擊美國。其中1949年8月15日發表的〈丟掉幻想，準備鬥爭〉便針對8月5日美國國務卿艾奇遜發佈的《中美關係白皮書》中所言的「民主個人主義」提出了對立性的概念——「民主集體主義」；<sup>138</sup>到四天後的〈別了，司徒雷登〉，

<sup>134</sup> 1929年12月，毛澤東在其起草的〈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案〉中列舉了「個人主義」的六種表現形式，即(1)報復主義，(2)小團體主義，(3)僱傭觀念，(4)享樂主義，(5)消極怠工，(6)離隊觀念。他認為，「個人主義的來源，在於小農思想一直到資產階級思想影響到黨內。」參見《毛澤東集》第2卷(井岡山期)，頁88-89。

<sup>135</sup> 毛澤東〈反對自由主義〉寫作日期是1937年9月7日，初刊《解放日報》(延安)，1942年4月10日，4版。

<sup>136</sup> 此文是1939年7月8日劉少奇在延安馬列學院的演講，連載於1939年延安《解放》週刊，第81期(延安，1939.08.20)，頁12-19；第82期(延安，1939.08.30)，頁9-15；第83、84期合刊(延安，1939.09.20)，頁8-20。

<sup>137</sup> 據美國〈中國學生評論〉(*Chinese Student Opinion*)1948年有關留美中國學生的一次調查反映，64.7%的人認為，美國不該軍事援助國民政府；57.3%的人認為美國在華「行為不檢及美國輕視中國主權」，具體見任以都，〈留美中國學生的思想測驗〉，《東方雜誌》，第44卷第9號(1948.09)，頁17-18。相關討論，亦可見張濟順，《中國知識分子的美國觀(1943-1953)》(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9)。

<sup>138</sup> 〈丟掉幻想，準備鬥爭〉，《人民日報》(北平)，1949年8月15日，1版。

他仍不忘記批判「民主個人主義」。<sup>139</sup>不過，這幾篇時評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毛澤東對於接受「民主個人主義」的自由知識分子的擔心。

為了配合毛澤東對「民主個人主義」的批判，1949年10月，北京《學習》雜誌第1卷第2期「問題商討」欄還專門為中共普通幹部辨析「民主個人主義」與「民主集體主義」的不同意涵，但這一辨析純粹是政治性的。文章說：「所謂民主個人主義，實際上即是舊民主主義或資產階級底自由主義的別名而已。」舊民主主義的「實質就是個人主義」，「個人主義與自我主義乃是舊民主主義或民主個人主義的中心思想。」「中國以前也有人想追求過這舊民主主義或民主個人主義的道路，但「五四時代已證明『此路不通』了。這才產生了中國共產黨與毛主席所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這個新民主主義也即是我們所說的民主集體主義。」<sup>140</sup>

既然「個人主義」屬於舊民主主義時期，是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固有意識之一，自然成為思想改造的對象。這一思想改造運動在1942年延安整風之後的又一次集中出現是在1949年初。這年3月15日，華北大學副校長范文瀾在華北大學第一區隊開學典禮上列舉了知識分子應改造的幾個方面，他說：

首先，許多知識分子眼睛有病：他們向上看，不向下看，這是小資產階級壞的一面——即羨慕大資產階級；所以我們要改造他，使他站在無產階級的立場，為工農勞動人民服務。還有，眼睛向後看，不向前看，這是因為小資產階級常常對舊的事物有留戀；我們讓他革舊更新，就可向前看。再有，是眼睛看近不看遠，這是因為小資產階級有自私心，去掉了個人自私主義，自可有遠大眼光。<sup>141</sup>

同年5月4日，中共出版部門的領導人宋雲彬在紀念「五四」的文章中也說：

知識分子又往往有一種主觀的個人主義的自大性，如果不能加以克服，到了革命的緊要關頭，他們會脫離群眾，而採取一種獨往獨來

<sup>139</sup> 〈別了，司徒雷登〉，《人民日報》（北平），1949年8月19日，1版。

<sup>140</sup> 未署名，〈「民主個人主義」與「民主集體主義」〉，《學習》，第1卷第2期（北京，1949.10），頁19。

<sup>141</sup> 古化，〈知識分子要下決心改造自己——記華北大學第一區隊開學典禮〉，《人民日報》（北平），1949年3月19日，4版。

的消極態度。甚至於感到日暮途遠，索性走回頭路，去接近帝國主義與大資產階級，並為他們服務而反對群眾了。<sup>142</sup>

據《人民日報》報導，從1949年3月至1950年3月底，華北大學已有兩期學員，共一萬七千餘人畢業。而他們需要改造的地方，是「多數學員思想上存在著濃厚的個人主義、自高自大和輕視勞動、輕視工農等剝削階級的意識和唯心觀點。」<sup>143</sup>

1950年6月25日，朝鮮戰爭爆發，10月19日中國人民志願軍入朝作戰，從此時一直到1951年底，集中的批判「親美」或「崇美」意識也給批判「個人主義」增添了新的內容。有留洋背景的舊知識分子在檢討「親美」或「崇美」時，基本都要歸結到所謂「個人主義思想」。曾在哈佛大學研究院獲得博士學位的法學家錢端升1949年後任北京大學法學院院長。他在檢討自己的「小資產階級出身的知識分子的思想意識」時，就把個人主義理解成「從個人利益出發」、「自由散漫」和「脫離群眾」，並且把工作和教學中出現的問題，都說成是「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的影響。<sup>144</sup>

為了配合對「個人主義」的批判，1949年8月《人民日報》還譯介了蘇聯哲學學者對「個性主義」的批判文章。但在這位蘇聯學者眼裡，「個性主義」好像沒有歐洲思想的淵源和歷史，僅僅是彼時美國哲學界的一個流派，而由於這個流派出自美國，所以必然「反動」，必然是反對社會主義蘇聯的。他說：

「個性主義」哲學也是現代反動派和帝國主義走狗套在自己頭上的假面具之一。

美國「個性主義」是勢力很大的現代反動哲學思潮之一。它的皈依者都是公開地以科學的唯物主義世界觀的死敵的姿態出現的，他們號召向進步的思想和理論作十字軍的進軍。<sup>145</sup>

<sup>142</sup> 宋雲彬，〈從「五四」看知識分子〉，《人民日報》（北平），1949年5月4日，6版。

<sup>143</sup> 新華社通訊，〈華北人民革命大學 教育改造大批知識青年〉，《人民日報》（北京），1950年5月8日，3版。

<sup>144</sup> 參見〈努力改造思想，做一個新中國的人民教師！為改造自己更好地服務祖國而學習〉，《人民日報》（北京），1951年11月6日，3版。

<sup>145</sup> 參見裴霍夫斯基著，梁香譯，〈「個性主義」哲學批判——現代資產階級反動哲學

當然，反對「個性主義」針對的還是接受思想改造的舊知識分子以「個性」為理由拒絕改造的傾向。同年 12 月，《人民日報》刊登的一篇〈談個性〉的短文，就給「個性」加上了「階級性」的定語，進而否定了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個性，文章最後說：

小資產階級出身的知識分子，其個性也是反映著小資產階級的特性的，如果我們要改造自己，那麼千萬不要說「我個性就是這樣」，來避免或搪塞正確的批評。我們要克服新舊思想「和平共居」的想法，要努力於用無產階級底集體主義來改造、替代非無產階級意識的個人主義的個性。<sup>146</sup>

早在 1951 年初，艾思奇概括出來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幾個特點，就從理論上釋放出了一個即將開展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的信號。艾思奇說，小資產階級的思想特點就是「小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其缺點有四：第一，輕視群眾，輕視勞動。第二，散漫性，無政府無組織的思想。第三，超階級的空想。第四，片面性、主觀性。而改造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個人主義」最好的方法，就是依據延安整風的經驗進行新一輪的整風。<sup>147</sup>

1949 年後中國大陸的歷次政治或思想改造運動的一大特點便是重復性。一個問題、一個對象或相同內容往往是重復地加以批判，如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中，舊知識分子所要檢討的「個人主義」表現，既包括比較空泛的如小資產階級的虛偽性、腐朽思想，也有相對具體的，像崇美思想、人生如夢、知識商業化、名流學者和國際學者的追求、純技術化(客觀化)等等。<sup>148</sup>這些批判對象和批判內容也延續到了「胡適思想批判」運動。方法上的重復則以 1942 年的延安整風運動為起點，此後，延安整風的方法被一

---

批判〉，《人民日報》(北京)，1949年8月22、23日，5版。

<sup>146</sup> 熊健，〈談個性〉，《人民日報》(北京)，1949年12月2日，6版。

<sup>147</sup> 艾思奇，〈論思想改造問題〉，《學習》，第3卷第7期(北京，1951.01)，頁6-9。

<sup>148</sup> 這幾個所謂「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具體表現是筆者從光明日報社編印的《思想改造文選》(北京：光明日報社，1951-1952)第1-5集中概括出來的。這套書收錄的主要是北京幾所大學著名「資產階級學者」公開或未公開發表在報刊上的檢討和自我批判一類的文章，其中也有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批判「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文章以及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的「收穫」總結和相關的新聞報導。第3集稍特殊，是有關散文家秦牧的批判專集。

次地採用、推廣、放大，乃至極端化，<sup>149</sup>其適用範圍也從中共黨內向非黨人士、知識分子和一般民眾中蔓延，直到 1966 年「文化大革命」爆發，終於釀成全民參與、全民動員、全民內鬥的浩劫。

由於「立場問題」一直被認為是政治運動或思想改造的首要問題，<sup>150</sup>在「胡適思想批判」運動中，對「個人主義」的批判首先就是定性，以確定政治或階級立場。李達將「個人主義」定性為「資產階級思想的基本原則」，說「個人主義思想在社會方面的表現是改良主義。」<sup>151</sup>而引申的批判是說，「胡適的『改良主義』的目的，是反對中國人民的革命運動。」<sup>152</sup>

正如前述，將「個人主義」庸俗化地理解為「自私自利」是毛澤東的傳統，這個傳統被轉化成一種政治標準，又使用在批判胡適「個人主義」的過程中。李達與胡繩都是中共黨內的理論家，他們的批判文章也具有相對的理論性，但政治標準讓他們都無視易卜生的個人主義以及胡適「健全的個人主義」的基本內涵，因而「理論性」也成了某種程度的自說自話。李達說胡適：

自己承認易卜生的個人主義代表著他自己的人生觀，代表著他自己的宗教，……對於讀書、作文章，對於作人、處事，到處要以「我」為標準，處處有一個「我」在。胡適的一切著作都貫穿著這種個人

<sup>149</sup> 有關延安整風運動的研究，參見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的來龍去脈》（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0）；陳永發，《延安的陰影》（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

<sup>150</sup> 毛澤東對「立場問題」的最早論述是在1925年12月所寫，1926年2月發表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中，1942年5月，他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又一次強調。〈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原刊《中國農民》，第1卷第2期（廣州，1926.02），收入《毛澤東集》第1卷（初期），頁161-174。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解放日報》，1943年10月19日，1版。另外，在1958年出版的《知識分子思想改造的關鍵——立場問題》一書中，作者總結出的經驗和方法，也反映了「立場問題」在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胡適思想批判」運動以及1957年的「反右」運動中的重要性。書中說：「知識分子進行思想改造最主要的問題，也就是知識分子思想改造的關鍵，是政治立場問題。」參見陳靜波，《知識分子思想改造的關鍵——立場問題》（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58），頁8。

<sup>151</sup> 李達，〈胡適思想批判〉，《新建設》，1955年1月號（北京，1955.01），頁4，又見《胡適思想批判（論文彙編）》第2輯，頁10。

<sup>152</sup> 參見汪子嵩、王慶淑、張恩慈、陶陽、甘霖，〈批判胡適的反動政治思想〉，《人民日報》（北京），1954年12月17日，3版。

主義思想。<sup>153</sup>

胡繩則將易卜生的個人主義直接與群眾對立起來。在他看來，胡適正是利用了易卜生，「公開表示輕視群眾而只重視個人和少數人，讚揚同社會對立的個性和個人自由獨立的精神」的。<sup>154</sup>

將胡適提倡的「個人主義」與群眾對立，實際上拆解了胡適「健全的個人主義」的道德依據。因為在「人民群眾有無限的智慧和偉大的創造力，是一切社會物質財富的創造者，是社會命運和各種革命鬥爭的決定者。世界歷史是由人民群眾創造的」之類的話語成為正統時，「個人主義」與群眾對立或與群眾疏離，就意味著無視歷史規律、歷史事實和鄙視底層民眾，從而被送上了道德法庭。沙英說：「在胡適眼中，人民群眾是愚昧無知的，是附和盲動的，是阿斗，是奴才，是貧窮、疾病的化身，並且是沒有什麼力量的」、「對於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胡適則是推崇備至。」<sup>155</sup>

進一步地批判是針對所謂「英雄史觀」。在歷史學家、復旦大學教授蔡尚思看來，「胡適的英雄的歷史觀點和他的自高自大都很富有買辦性」，「是帶有法蘭西性質的」，而這一切都源自胡適所堅持的「個人主義」。<sup>156</sup>另一個批判者汪毅說，「由於胡適認為哲學思想產生的根源不是社會的物質生活條件，而是思想家的個人才性」，加之堅持實用(驗)主義，《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也因此失去了學術價值。<sup>157</sup>侯外廬則從詹姆士(William James)有關西方哲學史「心硬」、「心軟」兩派的見解，推論出胡適「所謂『時勢』的含義不是客觀存在的現實，而『都是某時某地的有心人(?)』(按，括弧與問號為原文所有)對於那時那地的社會需要的救濟方法或藥方。」他說，「不管胡適怎樣詭辯什麼多元論，他的觀點總是個人英雄決定存在的唯心史觀。」

<sup>153</sup> 李達，〈胡適思想批判〉，頁4。

<sup>154</sup> 胡繩，〈論胡適派腐朽的資產階級人生觀〉，《人民日報》(北京)，1955年1月7日，3版。

<sup>155</sup> 以上均見沙英，〈論人民群眾和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兼評胡適對這個問題的反動觀點〉，《人民日報》(北京)，1955年2月5日，3版。

<sup>156</sup> 蔡尚思，〈論英雄創造歷史的唯心主義歷史觀——對胡適歷史觀點的批判〉，《解放日報》(上海)，1955年2月20日，4版。

<sup>157</sup> 汪毅，〈論胡適派反動的資產階級的哲學史觀點和方法〉，《文史哲》，1955年第4期(青島，1955.07)，頁17。

在胡適唯心史觀中，「思想家是脫離生產關係而存在的孤立的人物。」因此，「胡適的中國哲學史使用大量的身世考據去掩蓋思想家產生的歷史必然性，從而他也反對歷史唯物主義的有定論。」<sup>158</sup>在馮友蘭眼裡，胡適的具體研究也是以「他底自私自利的個人主義」為根據，馮甚至上綱上線，說胡適 1925 年發表的〈戴東原的哲學〉就是利用「個人主義」反對馬克思主義和共產黨。<sup>159</sup>

泛政治化時代對文學的要求，用黃藥眠的話說就是：

作為意識形態的文學，乃是社會存在所決定的，階級存在所決定的。社會上既然存在有階級，當然也就有階級鬥爭，而在有階級對立的社會裡，藝術文學上的各種不同的思想的流派也正是反映了階級鬥爭。

在他看來，胡適「很贊成周作人的『人的文學』，主張寫出『個性化』的人；否認文學之階級性和傾向性」，這就是典型的文學上的「個人主義」的表現。<sup>160</sup>

相關的「個人」或「個性自由」不僅是胡適，也是其他新文化運動代表人物提倡過的，但此時「個人」或「個性自由」也作為胡適反動思想的表現之一被庸俗化地解讀。如毛禮銳將胡適個人自由思想的危害歸納成了三個方面，他說：「胡適首先拿個人思想來反對學生運動。」其次：

胡適宣傳個人自由的反動思想的另一個目的，是企圖在人們中間散佈一種幻想，使許多知識分子尤其是小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迷戀於所謂「自由自在」的生活，而不與革命群眾相結合。

第三，「胡適還宣傳歪曲的『發展個性』的思想，使青年在自由發展自己的個性的幻想下，走入各種迷途，而不能自拔。」<sup>161</sup>

胡繩對胡適「個人主義」的批判進一步涉及到了「五四」的領導權以

<sup>158</sup> 侯外廬，〈從對待哲學遺產的觀點方法和立場批判胡適怎樣塗抹和誣蔑中國哲學史〉，《哲學研究》，1955年第2期(北京，1955.06)，頁100-101。

<sup>159</sup> 馮友蘭，〈哲學史與政治——論胡適哲學史工作和他底反動的政治路線底聯繫〉，《哲學研究》，1955年第1期(北京，1955.03)，頁74-75。

<sup>160</sup> 黃藥眠，〈胡適的反動文學思想批判〉，頁5-6。

<sup>161</sup> 毛禮銳，〈肅清胡適反動思想在教育上的影響〉，《光明日報》(北京)，1955年2月7日，3版。



及何為五四代表性思潮的問題。他說：

胡適把個人主義思想當做五四時期和五四以後的新思潮，這是完全不合乎事實的。早在五四運動以前，資產階級領導中國革命的時期，已經有許多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先進分子用個人主義的名義提倡個性解放。

他依據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中有關舊民主主義與新民主主義的劃分，直接將「個人主義」當成了「過時」的思潮。他說：

到了五四運動時期，尤其到了「五四」以後，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已經不是什麼先進的新思潮，更絕不能夠在實際生活中起領導作用。代替它的，已經出現了社會主義的集體主義的思潮。<sup>162</sup>

自此，胡適曾經引領新潮流的歷史形象也不復存在了。

## (二)「國際主義」與「世界主義」的話語之爭及其國際動因

與「個人主義」批判的起因稍有不同，中共對「世界主義」的批判不僅受蘇聯共產黨的影響極大，且與國際形勢有密切的關係。而「胡適思想批判」運動時對「世界主義」的批判，基本是 1940 年代蘇共批判「世界主義」的延續。

世界主義本是西方的一個與民族主義對立的古老思潮，一戰前後傳入中國，成為近代中國的重要思潮之一。新文化運動時期，陳獨秀、胡適等都以此為號召，希望取開放的姿態，以衝破狹隘的民族主義和極端愛國主義。「五四」後，雖然陳獨秀、李大釗等新文化人向左轉，信仰列寧主義，成立中國共產黨，但他們不僅沒有完全放棄世界主義，世界主義反而促進了他們接受馬克思列寧的一些理念。<sup>163</sup>1924 年 5 月，瞿秋白就把中國的民

<sup>162</sup> 以上見胡繩，〈論胡適派腐朽的資產階級人生觀〉，3版。

<sup>163</sup> 有關傳入近代中國以及五四前後世界主義的討論，參見安希孟，〈世界主義思潮：自西徂東〉，《哲學堂》（太原：書海出版社，2004）2004年卷，頁212-229；桑兵，〈世界主義與民族主義——孫中山對新文化派的回應〉，《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2期（北京，2003.03），頁77-99。

族主義等同於國際主義。<sup>164</sup>1927年初，已成為中共總書記的陳獨秀同樣信仰馬克思的「工人無祖國」一說。<sup>165</sup>因此，即使馬克思主義者提出的「國際主義」(Internationalism)與西方古老的世界主義(Cosmopolitanism)取向上有異，在形式上也並未截然二分。<sup>166</sup>

但到二戰後，這一切都發生了變化。為避免世界大戰再起，著名物理學家愛因斯坦在英國哲學家羅素之後，呼籲建立「世界政府」，這一運動的參加者包括了羅素、德國作家托馬斯·曼(Thomas Mann)、控制論的創始人維納(Norbert Wiener)和胡適。1947年8月，他們在瑞士蒙特勒召開國際大會，會上通過了在1950年秋建立取代聯合國的新的世界組織的活動計畫，<sup>167</sup>加之美國提出的復興歐洲的「馬歇爾計畫」和邱吉爾提出建立「歐洲合眾國」的設想，讓蘇共感覺到一種來自資本主義世界的威脅。1947年9月底，在波蘭舉行的「幾國共產黨情報代表會議」上，蘇共中央負責意識形態工作的領導人日丹諾夫即明確說，世界主義的「全球政府」(按，即通譯之「世界政府」)有「很鮮明的反蘇傾向。」<sup>168</sup>出於自保，1949年1月，蘇共在強化「愛國主義」的同時，也掀起了批判「資產階級的世界主義」的熱潮，其口

<sup>164</sup> 詳見瞿秋白，〈自民族主義至國際主義〉，頁537。瞿秋白此文使用的「國際主義」，就意義言，更接近於世界主義，而非後來蘇聯強調的純粹政治層面的「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

<sup>165</sup> 參見實(陳獨秀)，〈究竟是誰無祖國〉，《嚮導》，第187期(上海，1927.02)，頁4。

<sup>166</sup> 如吳康、周世輔所著《哲學概論》就說：「世界主義與國際主義不易在名詞上作嚴格的劃分，這裡擬分為侵略性與和平性兩大類，細分之，為帝國主義式的，理性的或學術性的，法律性的或聯合國式的，法西斯蒂式的，共產主義式的及民族自決性的等等。」參見吳康、周世輔，《哲學概論》(臺北：正中書局，1979)，頁315。但這個問題仍有討論的餘地。胡適晚年認為，「世界主義」比「國際主義」更為廣博，「國際主義」更局限於民族和國家的利益，這還是針對蘇聯所提倡的「國際主義」而言的。參見胡適口述，唐德剛記錄並翻譯，《胡適口述自傳》，收入《胡適全集》第18卷，頁208-230。但在蘇聯提倡的非常政治化和具有冷戰色彩的「國際主義」後，意識形態化的「國際主義」，也決定它與世界主義的對立。本文所說的「形式上的一致」是不含意識形態偏見的情況下，承認它們之間在總體傾向上(相對民族主義)的一致以及總體理念上的交疊。

<sup>167</sup> 具體見柴宇平，〈『世界國家觀』考評〉，《福建論壇》，1999年第1期(福州，1999.01)，頁75。

<sup>168</sup> 參見契爾諾夫等著，張孟恢譯，《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與資產階級的世界主義》(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52)，頁29。此書開頭的部分主要論述的就是所謂「世界主義的威脅」，頁1-5。

號便是以「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對抗「資產階級的世界主義。」<sup>169</sup>

中共領導人中最先關注蘇共批判「資產階級的世界主義」的是劉少奇。由他 1948 年 11 月 1 日起草，並於 7 日發表的〈論國際主義與民族主義〉本是代表中共中央表態支援蘇聯，反對南斯拉夫共產黨的領導人和聯邦政府總理鐵托的「反蘇行為」。但在文中，劉少奇譴責杜魯門主義、「馬歇爾計畫」以及強調堅持「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反對「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等等，都與後來的批判「資產階級的世界主義」相關。而劉少奇將贊同抑或反對向蘇聯「一邊倒」的政策作為「革命」抑或「反革命」的衡量標準，<sup>170</sup>也決定了在批判「資產階級的世界主義」的問題上中共的全盤蘇聯化。<sup>171</sup>

1949 年 2 月 22 日，《人民日報》刊登的第一篇全面批判「資產階級的世界主義」的文章即譯自蘇聯《少共真理報》。<sup>172</sup>5 月 11 日題為〈「歐洲委員會」是侵略的政治武器〉的新華社電訊稿，報導的也是關於蘇聯方面的

<sup>169</sup> 具體見新松、蕭三，〈蘇聯思想戰線上一個嚴肅的鬥爭——反動資產階級的世界主義運動〉，收入派夫洛夫等著，君強等譯，《論「世界主義」》（北京：群眾書店，1950），頁94-104。

<sup>170</sup> 劉少奇說：「正如毛澤東同志在其〈新民主主義論〉中所闡釋的，或者聯合蘇聯，或者聯合帝國主義，二者必居其一。這是愛國與賣國的界限，這是革命與反革命的界限，這是世界上不論那個民族是走向進步或是走向倒退的界限，而反對蘇聯，必然只符合帝國主義的利益，背叛自己民族的利益。」具體參見〈論國際主義與民族主義〉，《人民日報》（石家莊），1948年11月7日，1-2版。當然，劉少奇此文出現的突兀，也引發了中共內部的一些疑問，《人民日報》不得不出面答疑解惑。其中說：「民族問題要看是資產階級提出或是無產階級提出，如資產階級提出，則為對內壓迫國內人民，對外侵略別的民族；如無產階級提出，則為堅決反對任何的民族壓迫，既反對別的民族壓迫自己民族，又反對自己民族壓迫別的民族。」參見《人民日報》（石家莊），1949年1月15日，4版。

<sup>171</sup> 在中共何時開始向蘇聯「一邊倒」的問題上，國內與國外學者的看法有一定的差異。依筆者之見，這一差異主要緣於如何理解中共及毛澤東對內與對外表態上不同話語。但大家都認為，1949年6月30日毛澤東〈論人民民主專政〉的發表，意味著「一邊倒」政策的正式確定。具體參見章百家，〈新中國外交方針的形成和實施〉，收入郭德宏、王海光、韓鋼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稿》（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卷1，頁85-88；以及費正清、羅德里克·麥克法誇爾（Roderick MacFarquhar）主編，王建朗等譯，陶文釗等校，《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1949-1965）》（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第六章（本章由中島嶺雄撰寫），頁276-288。

<sup>172</sup> 斯卡特謝科夫著，仲平譯，〈愛國主義與國際主義——少共真理報「答讀者問」〉，《人民日報》（石家莊），1949年2月22日，4版。

批判情況。<sup>173</sup>6月14日,《人民日報》刊登的〈揭穿資產階級的「世界主義」〉一文也是翻譯自蘇聯《新時代》週刊。<sup>174</sup>7月15日,另一篇從理論上批判「資產階級的世界主義」的文章同樣譯自《新時代》週刊。<sup>175</sup>7月29日的〈世界主義——美國反動派的思想武器〉來自4月7日蘇聯《真理報》,<sup>176</sup>9月30日編譯的〈資產階級的世界主義及其反動作用〉則出自1949年第5期的蘇共《布林塞維克》雜誌。<sup>177</sup>而陸續出版的相關著作和文集,也基本來自蘇聯。

以筆者所見,1949至1954年翻譯或編譯引進中國大陸的蘇聯或其它社會主義陣營國家提倡「國際主義」,批判「世界主義」的著作、文集以及國內學者的相關著作,計有二十本之多(具體列表,詳見本文附錄)。其中1949年至1950年是中共利用蘇聯理論資源批判「世界主義」最集中的時段。相關出版物中,除少數譯自專著外,大部分是譯自報刊,屬文章結集。這些文章有蘇共中央機關報《真理報》社論,有其它蘇聯報刊(如《少共真理報》、《新時代》雜誌、《布林塞維克》雜誌)的社論和時評,也有的是直接譯自《蘇聯大百科全書》的相關辭條。<sup>178</sup>從具體內容上看,都大同小異,基本是表態式地歌頌「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譴責「資產階級的世界主義」;讚揚「社會主義的愛國主義」,反對「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而分別加上「無產階級的」和「資產階級的」定語後的「國際主義」與「世界主義」成了兩個完全不同的政治概念。「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重視各民族的差異和國家利益,是正義的象徵,而「資產階級的世界主義」則是擴張帝國主義霸權

<sup>173</sup> 新華社電文,〈「歐洲委員會」是侵略的政治武器〉,《人民日報》(石家莊),1949年2月22日,3版。

<sup>174</sup> 此為1949年3月16日蘇聯《新時代》週刊社論,鏡澄譯,〈揭穿資產階級的「世界主義」〉,《人民日報》(北京),1949年6月14日,4版。

<sup>175</sup> A·里昂吉葉夫著,賈午、魏微譯,〈世界主義與國際主義〉,《人民日報》(北平),1949年7月15日,4版。

<sup>176</sup> 君強、曹汀譯,〈世界主義——美國反動派的思想武器〉,《人民日報》(北平),1949年7月29日,5版。《人民日報》刊文時未署作者名,應為派夫洛夫,後收入《論世界主義》(北京:群眾書店,1950)。

<sup>177</sup> 切爾諾夫著,周南節譯,曹汀校,〈資產階級的世界主義及其反動作用〉,《人民日報》(北平),1949年9月30日,7版。

<sup>178</sup> 如斯切潘諾娃著,葆煦譯,《國際主義》(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

的工具。

在批判「世界主義」的問題上，中共方面主要是與蘇聯統一口徑，以蘇共理論為指南。1949年6月19日，郭沫若在全國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開幕典禮上發言，重復的就是蘇共的批判話語。<sup>179</sup>隨後的幾年，這種情況也沒有發生根本的變化。1950年4月22日，《人民日報》上題為〈紀念列寧，學習國際主義〉的社論基本是口號式的。<sup>180</sup>1951年《世界知識》雜誌第3期發表的關稼農〈關於世界主義〉，則是向公眾解釋「為什麼世界主義是美帝國主義侵略的思想武器？」但從這篇「國際問題解答」專欄的文章完全抄錄自現成的已經編譯發表和出版的蘇聯批判「世界主義」的相關文章<sup>181</sup>也可見，中共對「世界主義」的批判確是全盤蘇聯化的。

由於缺乏具備國際視野的人才，中共此時不可能提出比蘇聯更深刻的「國際主義」理論，這也決定了中共對「世界主義」的批判只能以配合蘇共和本國輿論上的反美宣傳的方式，以及伴隨知識分子思想中肅清「親美」、「崇美」意識而展開，未升級成以此為主旨的「政治運動」，當然這是就理論言。現實地看，中共「一邊倒」的政策需要「國際主義」的宣傳，反美又需要提倡「愛國主義」，「抗美援朝」則需要「國際主義」和「愛國主義」兼俱。<sup>182</sup>這種複雜的現實，也使中共無力廣泛而深入地批判「世界主義」。

<sup>179</sup> 詳見新華社電文，〈毛主席等七人在新的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上的講詞〉，《人民日報》（北平），1949年6月20日，1版。

<sup>180</sup> 〈紀念列寧，學習國際主義〉，《人民日報》（北京），1950年4月22日，1版。

<sup>181</sup> 關稼農，〈關於世界主義〉，《世界知識》，1951年第3期（北京，1951.03），頁22。此文主要轉錄自君強、曹汀譯，〈世界主義——美國反動派的思想武器〉，5版；切爾諾夫著，周南節譯，曹汀校，〈資產階級的世界主義及其反動作用〉，7版。又見契爾諾夫等著，李少甫譯，《蘇聯的愛國主義與資產階級的世界主義》（北京：中華書局，1950）。

<sup>182</sup> 比如1949年8月底，中共華東局召開宣傳教育會議，要求組織宣傳，「著重說明革命的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的一致性。強調宣傳『一面倒』的思想。」參見〈加強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教育 華東局宣教會議確定工作方針〉，《人民日報》（北平），1949年9月8日，2版。與此同時，東三省也開展了「國際主義」的宣傳。具體見〈廣泛宣傳國際主義 東北各地正熱烈籌備 紀念蘇聯十月革命節〉，《人民日報》（北京），1949年11月5日，4版。只是東三省的「國際主義」更多地是體現在中蘇友誼上。1951年10月25日，中國人民志願軍政治部副主任杜平也發表文章，強調抗美援朝所體現的「愛國主義與國際主義」，參見〈愛國主義與國際主義是中國人民志願軍力量的源泉〉，《人民日報》（北京），1951年10月25日，4版。

而由於意識形態的介入，世界主義也被化約為簡單的政治公式。原來「國際主義」與「世界主義」理論上的重疊部分變得不復存在，所有的解讀（包括譯介的蘇聯文章中的解讀和批判）都是政治層面的，只關乎所謂「政治立場」或「階級立場」。簡言之，即「國際主義」代表著無產階級的利益，而「世界主義」代表著資產階級的利益。這一化約的特點延續到對胡適「世界主義」的揭露和批判時，更顯得膚淺而口號化。

在「胡適思想批判」運動開始後，最早涉及「世界主義」的批判文章是北京大學哲學系的青年教師和黨的負責人汪子嵩、王慶淑等合寫的〈批判胡適的反動政治思想〉。他們羅列的胡適的第一條「罪狀」就是「宣傳反愛國主義的『世界主義』」。文章寫道：「為了宣傳他的『世界主義』，他便千方百計來製造種種『美國是中國最好的朋友』的神話」，「為了要給崇美思想奠定基礎，就拼命來宣傳民族自卑感。」<sup>183</sup>既然批判「世界主義」與反對「親美」、「崇美」聯繫在一起，指斥胡適是美帝國主義的「走狗」或「奴才」也就成了「胡適思想批判」運動中最常用的批判話語。如另一位批判者楊正典在指斥胡適是「美帝國主義的奴才」後就說：

實用主義是資本主義發展到崩潰沒落階段的產品，是帝國主義的暴力政策世界主義的理論基礎，是無產階級和全體進步人類的死敵，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哲學的死敵。<sup>184</sup>

在批判胡適的「世界主義」時，馮友蘭、賀麟這兩位胡適北大的學生和同事，免不了引經據典，但既已捲入政治運動，就難以自主，他們相關的批判不僅不能改變膚淺和口號化的總體傾向，也頗有失哲學家的風度和嚴謹。賀麟明知胡適是無神論者，卻將胡適〈不朽〉中「我的宗教」的說法直接解讀成胡適信仰超越世俗的宗教，<sup>185</sup>且由此推衍，將胡適1934年發表的〈說儒〉中，以基督教耶穌教主地位的誕生來類比孔子儒教「教主」的嘗試性和時代性的論斷，<sup>186</sup>也一併指責為「世界主義」和唯心論。這等

<sup>183</sup> 汪子嵩、王慶淑、張思慈、陶陽、甘霖，〈批判胡適的反動政治思想〉，3版。

<sup>184</sup> 楊正典，〈徹底肅清反動哲學思想實用主義的影響〉，《人民日報》（北京），1954年12月20日，3版。

<sup>185</sup> 胡適，〈不朽〉，《新青年》，第6卷第2期（北京，1919.02），頁96-105。

<sup>186</sup> 參見胡適，〈說儒〉，《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4本第3分（上海，

於是將任何的中西思想及文化的比較研究都納入到了「反革命」或「反動思想」的範疇。<sup>187</sup>而眾所周知，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研究基本是延續著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所開闢的「以西釋中」的路向而青出於藍的。但在批判胡適「世界主義」時，他卻自斷其腕，指責胡適所開創的借鑒外來觀念建構中國哲學史新典範的方式，「不僅暴露了資產階級唯心史觀和世界主義的毒素，也是從庸俗進化論的發展觀中引導出來的反科學的謬論。」<sup>188</sup>

1955年初，中山大學教授羅克汀在《中山大學學報》第1期上發表〈胡適是美國實用主義者底「世界主義」思想的宣傳員〉，同年2月22日此文簡寫本〈什麼是「世界主義」？〉又刊登在《光明日報》上。這也是「胡適思想批判」運動中批判「世界主義」最系統的一篇文章。不過，從內容上看，也是膚淺而口號化傾向的典型。

囿於政治成見，羅克汀將「世界主義」在中國傳播的源頭歸結為1920年代無政府主義思潮的一部分，顯然在時間與內容上都有誤。在他看來，一旦這個思潮與美帝國主義聯繫在一起，就是十足的反動思想。他模仿蘇聯學者的口氣說：

「世界主義」是一種極端反動的思想，它是為了便於壟斷資本統治全世界的極端反動的說教。現今，它是美帝國主義用來進行侵略，企圖用來建立世界霸權的思想武器。「世界主義」的宣傳員往往扮成為國家主義的反對者，裝扮成為民族主義的反對者，但他們的目的卻是使各國人民拋棄愛國主義思想，停止爭取獨立、自由、解放的關鍵，以便給美帝國主義作奴隸。

針對胡適的「世界主義」，羅克汀也基本是在貼標籤、喊口號，他說胡適是美帝國主義的義務「宣傳員」，鼓吹「全盤西化」，「企圖為美帝國主義的侵

---

1934.12)，頁233-284。

<sup>187</sup> 具體見賀麟，〈兩點批判，一點反省〉，3版。另外，北大哲學系的王慶淑在〈批判胡適的「不朽」論〉中也認為，胡適鼓吹易卜生主義，是企圖「創立新宗教，宣揚變相的神不滅論。」參見王慶淑，〈批判胡適的「不朽」論〉，《光明日報》(北京)，1955年1月26日，3版。

<sup>188</sup> 參見馮友蘭、朱伯崑，〈批判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的實用主義觀點和方法〉，《人民日報》(北京)，1955年6月24日，3版。

略中國開闢道路。」<sup>189</sup>喊口號的還有白壽彝。他已經完全領會了蘇聯日丹諾夫「保衛蘇聯」的口號精神，他說：

「民族主義與世界主義是一個牌子的兩面」，帝國主義「用民族主義來欺騙本國人民去賤視其他民族，又用世界主義去欺騙別國人民受他的統治。」而「奴才已經成型的胡適是以自命為世界主義者而沾沾自喜的」、「也像別的世界主義者一樣，胡適一方面頌揚美國，另一方面就必然誹謗蘇聯。」<sup>190</sup>

以上對「世界主義」的批判，儘管理由不同，就結果上看，「世界主義」這個原本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重要思潮，已在「胡適批判思想」運動中被徹底從五四歷史中抽離了。看上去用「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替代「世界主義」只是名詞之別，其實前者暗含的是民族主義意識。而這種以提倡「愛國主義」為表現形式的民族主義意識，也成為 1950 年代至今大陸政治宣傳和思想教育中的重要內容和基本組成部分。

## 六、餘論

1949 年 10 月以後，中國大陸對於「五四」定義的討論一開始便是圍繞著兩個方面進行的，一是性質，二是領導者。這個特點在解放區背景的大學的有關討論中顯得更為突出。1950 年華北大學討論李何林《近三十年中國新文學運動大綱》的講稿時，就涉及到如何確定「五四」的性質和領導者的問題。這個討論得到了華北大學正、副校長，中共黨內的元老吳玉章和理論家成仿吾的支持，參與討論的有范文瀾、何幹之和錢俊瑞等中共黨內的歷史學家、經濟學家。他們非常認真地相互切磋，但所依據的理論和原則無一例外，都來自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sup>191</sup>

<sup>189</sup> 羅克汀，〈胡適是美國實用主義者底「世界主義」思想的宣傳員〉，《中山大學學報》，1955 第 1 期(廣州，1955.01)，頁 1-9。羅文有關「世界主義」的說法，基本出自蘇聯的相關譯著如魯賓斯坦著，張孟恢譯，《世界主義與國際獨佔資本》(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50)。

<sup>190</sup> 白壽彝，〈胡適對待祖國歷史的奴才思想〉，頁 16。

<sup>191</sup> 參見余飄，〈記華北大學一次關於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性質與領導思想的討論〉，《新文學史料》，1991 年第 2 期(北京，1991.03)，頁 181。



到「胡適思想批判」運動開始後，參與批判的新舊知識分子的情況不盡相同，但大多數舊知識分子都不是出於自願的。因此，「胡適思想批判」運動中的「五四」政治形象和政治話語不是正面灌輸而是從反面，以批判的方式反向建構的。這也是 1949 年以後，許多政治話語建構的共同特點。但無論是從正面的灌輸，還是從反面、以批判方式進行，最終的結果都是一個符合政治需要的權威性的「標準答案」的形成。

1949 年 10 月後的毛澤東發動的政治或思想批判運動中的重要傾向，除了「政治掛帥」以外，就是隨著運動的開展，批判的力度不斷地加大，且趨向極端化，而過分地極端化又引發了運動組織者的擔憂。在運動結束時，他們往往以溫和的姿態來糾正批判運動中的極端傾向，部分地使運動走向緩和，從而避免了整體沖突的爆發。

「胡適思想批判」運動也不例外。到 1955 年 5 月，〈中宣部胡適思想批判運動的情況和今後工作的報告〉就指出了運動的幾個缺點，即：

第一，這次思想批判運動對廣大幹部和知識分子群眾的影響還不夠深廣。

第二，這次思想批判，在各個學術部門中的發展還不平衡。哲學方面批判比較充分，政治社會思想和文學思想方面次之。……另外，歷史學、教育學等重要方面，批判還未充分開展。

第三：

由於我們理論工作基礎薄弱，雖然發表的文章很多，而且水平逐漸提高，但好的研究文章終究還嫌太少，目前發表的文章也是什麼問題都說到一些的概論性的居多，集中一個問題作比較深入分析的較少；揭露批判的居多，結合批判作正面宣傳的較少，在批判中進一步發揮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觀點的更少。同時許多論文在批判方法上還有許多缺點，有的個別論點還有錯誤。批判方法方面的缺點是：許多作者不善於從根本上抓住胡適思想的實質，不善於揭露胡適思想內部的自相矛盾混亂，不善於揭露胡適騙人的手法，常常摘引胡適的幾句話就大做文章，用駁斥胡適每一句話的方法來進行戰鬥，甚至還不符原意地加以引伸，連同胡適用來偽裝自己的、本意正確

的話也加以否定。有的文章論證不多，說理不夠，結論武斷。有的作者過多注意胡適的家世與私德，而對胡適思想卻分析不夠。論點方面的錯誤是：有些作者在駁斥胡適的錯誤觀點時，走到另一個極端，如在反對胡適改良主義時認為：「革命是革命階級實行的，改良是反革命階級實行的」；……有些作者揭發胡適思想的本質是買辦思想的時候，卻武斷地說胡適提倡白話文，是反映了美國對中國進行經濟侵略需要統一語言的要求，反映了帝國主義與封建主義的矛盾；認為胡適的「所謂『文學改良』的大旗是一面反革命的旗子」。此外，還有個別作者在寫批判文章時，粗枝大葉，發生個別事實的錯誤，如把實用主義頭子約翰·杜威和美國共和黨頭子托馬斯·杜威弄成一個人，說約翰·杜威競選過美國總統。<sup>192</sup>

「胡適思想批判」運動以後，對於「五四」的認知和評價，至少在中國大陸的政治領域與公共領域變得齊整劃一了。「五四」的政治形象和政治話語，可以概括為：「五四」運動是新民主主義革命開端，其訴求是「反帝」、「反封建」，口號是「科學」和「民主」；政治上的代表是李大釗、毛澤東，文化上的代表是魯迅，總之，它不僅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奠定了思想上的基礎和幹部上的準備，也是世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一部分。而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中對 1840 年鴉片戰爭以來，特別是「五四」後歷史的書寫或塑造，已經不再是個人的歷史敘事，而是權威的符合歷史發展規律的「客觀歷史」。

這種狀況持續到 1980 年代初。隨著大陸社會和思想的開放以及近代中國歷史研究的深入，才漸漸在學術界內部有所改變，並且在當下形成了一個有趣的學術上的五四和政治上的「五四」的共生現象。

---

<sup>192</sup> 參見〈中央宣傳部關於胡適思想批判運動的情況和今後工作的報告〉，頁 564。

## 七、附錄

表2：1949至1954年中國大陸翻譯或編譯的蘇聯和其它社會主義陣營國家  
以及國內學者有關「國際主義」和「世界主義」的專著、論文集出版情況表

書名	作(編)者、譯者	出版社、出版地、 出版時間
《國際主義宣傳教育參考文件彙集》	華北軍政大學政治部編印	石家莊，1949， 未正式出版
《國際主義與民族主義》	解放社編	天津：新華書店，1949
《論蘇聯的愛國主義》	(蘇)魏金斯基等著，吳敏等譯	北京：群眾書店，1950
《論國際主義》	劉少奇及多位蘇聯作者著	北京：群眾書店，1950
《論「世界主義」》	(蘇)派夫洛夫等著，君強等譯	北京：群眾書店，1950
《蘇聯文學與藝術的方向》	金人輯譯	瀋陽：東北新華書店，1950
《蘇聯的愛國主義與資產階級的世界主義》	(蘇)契爾諾夫等著，李少甫譯	北京：中華書局，1950
《世界主義與國際獨佔資本》	(蘇)魯賓斯坦著，張孟恢譯	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 1950
《論文藝中的世界主義》	《真理報》等報刊社論及多名蘇聯作者著，冰夷等譯	北京：時代出版社，1950
《反對哲學科學文藝中的世界主義》	(羅馬尼亞)拉烏度、(美)哈利·馬特爾、瑪律文·雷斯著，杜若譯	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 1950

《什麼叫國際主義》	施言編寫	上海：人人出版社，1950
《國際主義的標誌》	中共察哈爾省張家口市委宣傳部編	張家口，1950
《「世界政府」是美帝陰謀統治世界的工具》	(蘇)波林茲著，彭菊人譯	上海：作家書屋，1951
《蘇維埃愛國主義與資產階級的世界主義》	(蘇)季達連科著，李逸譯	北京：中外出版社，1951
《世界主義——美國戰版的工具》	(蘇)魯賓斯坦著，蔡濟時譯，	北京：中外出版社，1951
《蘇聯人民的愛國主義與國際主義》	戈揚編	武漢：湖北省中蘇友好協會，1951
《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與資產階級的世界主義》	(蘇)契爾諾夫著，張孟恢譯	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52
《國際主義基本知識》	平心著	上海：新知識書店，1952； 上海：展望週刊社，1952
《蘇聯的愛國主義與國際主義》	(蘇)瑪丘什金著，李丕坤譯	北京：中華書局，1953
《國際主義》	(蘇)斯切潘諾娃著，葆煦譯	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

## 徵引書目

### *Bibliography*

#### (一) 史料及文獻集

《胡適思想批判(論文彙編)》第1-5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55。

*Hushi si xiang pi pan (lun wen hui bian), di 1-5 ji*, Beijing: Sheng huo, du shu, xin zhi san lian shu dian, 1955。

山東大學教務處校刊編輯室編輯，《山東大學思想改造文集》，青島：山東大學教務處校刊編輯室印行，1952。

*Shandong da xue jiao wu chu xiao kan bian ji shi, bian ji. Shandong da xue si xiang gai zao wen ji*, Qingdao: Shandong da xue jiao wu chu xiao kan bian ji shi yin xing, 1952.

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黨史黨建政工教研室編，《中共黨史參考資料》，第20冊，北京：國防大學出版社，1986。

*Zhong guo ren min jie fang jun guo fang da xue dang shi dang jian zheng gong jiao yan shi, bian. Zhong gong dang shi can kao zi liao, di 20 ce*, Beijing: Guo fang da xue chu ban she, 1986.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注，《李大釗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Zhong guo Lidazhao yan jiu hui, bian zhu. Lidazhao quan ji, di 4 juan*, Beijing: Ren min chu ban she, 2006.

光明日報社編印，《思想改造文選》第1-5集，北京：光明日報社，1951-1952。

*Guang ming ri bao she, bian yin. Si xiang gai zao wen xuan, di 1-5 ji*, Beijing: Guang ming ri bao she, 1951-1952.

朱光潛，《朱光潛全集》第10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

*Zhu, Guangqian. Zhuguangqian quan ji, di 10 juan*, Hefei: Anhui jiao yu chu ban she, 1993.

竹內實監修，毛澤東文獻資料研究會編集，《毛澤東集》第1(初期)、2(井岡山期)、7(延安期Ⅲ)卷，東京：北望社，1970-1972，東京一山圖書供應1976年影印本。

*Takeuchi Minoru, jian xiu, Maozedong wen xian zi liao yan jiu hui, bian ji. Maozedong ji, di 1 (chu qi), 2 (Jinggangshan qi), 7 (Yanan qi III) juan*, Tōkyō: Kitamochisha, 1970-1972, Tōkyō Hitoyama Tosho gong ying 1976 nian ying yin

ben.

艾思奇，《「有的放矢」及其他——哲學·文藝·隨感集》，上海：海燕書店，1951。

Ai, Siqi. *"You de fang shi" ji qi ta: zhe xue, wen yi, sui gan ji*, Shanghai: Hai yan shu dian, 1951.

艾思奇，《艾思奇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Ai, Siqi. *Aisiqi wen ji, di 1 juan*, Beijing: Ren min chu ban she, 1981.

艾思奇，《艾思奇全書》，第1-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Ai, Siqi. *Aisiqi quan shu, di 1-3 juan*, Beijing: Ren min chu ban she, 2006.

何幹之，《近代中國啟蒙運動史》，上海：生活書店，1937。

He, Ganzhi. *Jin dai zhong guo qi meng yun dong shi*, Shanghai: Sheng huo shu dian, 1937.

余飄，〈記華北大學一次關於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性質與領導思想的討論〉，《新文學史料》，1991年第2期(北京，1991.03)，頁181-183。

Yu, Piao. "Ji Huabei da xue yi ci guan yu wu si xin wen hua yun dong de xing zhi yu ling dao si xiang de tao lun," *Xin wen xue shi liao*, 1991 nian di 2 qi (Beijing, 1991.03), 181-183.

杜春和、韓榮芳、耿來金編，《胡適論學往來書信選》下冊，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

Du, Chunhe, Han Rongfang, Geng Laijin, bian. *Hushi lun xue wang lai shu xin xuan, xia ce*, Shijiazhuang: Hebei ren min chu ban she, 1998.

契爾諾夫等著，李少甫譯，《蘇聯的愛國主義與資產階級的世界主義》，北京：中華書局，1950。

Qi er nuo fu, deng zhe, Li Shaofu, yi. *Su lian de ai guo zhu yi yu zi chan jie ji de shi jie zhu yi*, Beijing: Zhong hua shu ju, 1950.

契爾諾夫等著，張孟恢譯，《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與資產階級的世界主義》，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52。

Qi er nuo fu, deng zhe, Zhang Menghui, yi. *Wu chan jie ji de guo ji zhu yi yu zi chan jie ji de shi jie zhu yi*, Beijing: Sheng huo, du shu, xin zhi san lian shu dian, 1952.

派夫洛夫等著，君強等譯，《論「世界主義」》，北京：群眾書店，1950。

Pai fu luo fu, deng zhe, Jun Qiang, deng yi. *Lun "shi jie zhu yi"*, Beijing: Qun zhong shu dian, 1950.

胡頌平編，《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北京：中國友誼出版社，1993。

Hu, Songping, bian. *Hushizhi xian sheng wan nian tan hua lu*, Beijing: Zhong guo you yi chu ban she, 1993.

- 胡頌平編著，《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6冊，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4。
- Hu, Songping, bian zhe. *Hushizhi xian sheng nian pu zhang bian chu gao*, di 6 ce, Taipei: Lian jing chu ban shi ye gong si, 1984.
- 胡適，〈說儒〉，《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4本第3分(南京，1934.12)，頁233-284。
- Hu, shi. "Shuo ru," *Guo li zhong yang yan jiu yuan li shi yu yan yan jiu suo ji kan*, di 4 ben di 3 fen (Nanjing, 1934.12), 233-284.
- 胡適，《胡適全集》第18、25、31、34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
- Hu, Shi. *Hushi quan ji*, di 18, 25, 31, 34 juan, Hefei: Anhui jiao yu chu ban she, 2003.
- 夏鼐，《夏鼐日記》第5卷，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
- Xia, nai. *Xianai ri ji*, di 5 juan, Shanghai: Hua dong shi fan da xue chu ban she, 2011.
- 耿雲志編，《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第36冊，合肥：黃山書社，1994。
- Geng, Yunzhi, bian. *Hushi yi gao ji bi cang shu xin*, di 36 ce, Hefei: Huang shan shu she, 1994.
- 張聞天編著，《中國現代革命運動史》，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7。
- Zhang, Wentian, bian zhe. *Zhong guo xian dai ge ming yun dong shi*, Beijing: Zhong guo ren min da xue chu ban she, 1987.
- 郭沫若，《沫若文集》第13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3。
- Guo, Moruo. *Moruo wen ji*, di 13 juan, Beijing: Ren min wen xue chu ban she, 1963.
- 陳靜波，《知識分子思想改造的關鍵——立場問題》，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58。
- Chen, Jingpo. *Zhi shi fen zi si xiang gai zao de guan jian: li chang wen ti*, Zhangchun: Jilin ren min chu ban she, 1958.
- 嵇文甫，《嵇文甫文集》上卷，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
- Ji, Wenfu. *Jiwenfu wen ji*, shang juan, Zhengzhou: Henan ren min chu ban she, 1985.
- 斯切潘諾娃著，葆煦譯，《國際主義》，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
- Si qie pan nuo wa, zhe, Bao Xu, yi. *Guo ji zhu yi*, Beijing: Ren min chu ban she, 1954.
- 華崗，《1925年至1927年的中國大革命史》，上海：春耕書局，1931。
- Hua, Gang. *1925 nian zhi 1927 nian de zhong guo da ge ming shi*, Shanghai: Chun geng shu ju, 1931.
- 華崗，《中國民族解放運動史》第1-2卷，上海：讀書出版社，1940。

- Hua, Gang. *Zhong guo min zu jie fang yun dong shi*, di 1-2 juan, Shanghai: Du shu chu ban she, 1940.  
華崗, 《五四運動史》, 上海: 海燕書店, 1951。
- Hua, Gang. *Wu si yun dong shi*, Shanghai: Hai yan shu dian, 1951.  
黃裳、潘際炯編, 《從墮落到反動的美國文化》, 上海: 平明出版社, 1951。
- Huang, Shang, Pan Jijiong, bian. *Cong duo luo dao fan dong de mei guo wen hua*, Shanghai: Ping ming chu ban she, 1951.  
新華通訊社編印, 《新華社社論集(1947-1950)》, 北京: 新華通訊社, 1960。
- Xin hua tong xun she, bian yin. *Xin hua she she lun ji (1947-1950)*, Beijing: Xin hua tong xun she, 1960.  
趙儷生、高昭一, 《趙儷生高昭一夫婦回憶錄》,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10。
- Zhao, Lisheng, Gao Zhaoyi. *Zhaolisheng Gaozhaoyi fu fu hui yi lu*, Taiyuan: Shanxi ren min chu ban she, 2010.  
魯賓斯坦著, 張孟恢譯, 《世界主義與國際獨佔資本》, 北京: 世界知識出版社, 1950。
- Lu bin si tan, zhe, Zhang Menghui, yi. *Shi jie zhu yi yu guo ji du zhan zi ben*, Beijing: Shi jie zhi shi chu ban she, 1950.  
瞿秋白, 《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論編》第2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8。
- Ju, Qiubai. *Juqiubai wen ji, zheng zhi li lun bian*, di 2 juan, Beijing: Ren min chu ban she, 1988.  
顧潮編著, 《顧頤剛年譜(增訂本)》, 北京: 中華書局, 2011。
- Gu, Chao, bian zhe. *Gujiegang nian pu (zeng ding ben)*, Beijing: Zhong hua shu ju, 2011.  
顧頤剛, 〈我是怎樣寫《古史辨》的? (下)〉, 收入中國哲學編輯部編, 《中國哲學》第6輯, 北京: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1981。
- Gu, Jiegang. “Wo shi zen yang xie ‘Gu shi bian’ de? (xia),” shou ru, *Zhong guo zhe xue bian ji bu, bian, Zhong guo zhe xue*, di 6 ji, Beijing: Sheng huo, du shu, xin zhi san lian shu dian, 1981.  
顧頤剛, 《顧頤剛日記》第7卷, 臺北: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2007。
- Gu, Jiegang. *Gujiegang ri ji*, di 7 juan, Taipei: Lian jing chu ban shi ye gong si, 2007.  
顧頤剛, 《顧頤剛讀書筆記(古柯庭瑣記之二)》第6卷, 臺北: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1990。
- Gu, Jiegang. *Gujiegang du shu bi ji (gu ke ting suo ji zhi er)*, di 6 juan, Taipei: Lian jing chu ban shi ye gong si, 1990.



龔克昌整理，〈陸侃如自述〉，收入國務院學位委員會辦公室編，《中國社會科學家自述》，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

Gong, Kechang, zheng li. "Lukanru zi shu," shou ru, Guo wu yuan xue wei wei yuan hui ban gong shi, bian, *Zhong guo she hui ke xue jia zi shu*, Shanghai: Shanghai jiao yu chu ban she, 1997.

## (二)報刊雜誌

《人民日報》(石家莊，北平，北京)，1948-1955。

*Ren min ri bao* (Shijiazhuang, Beiping, Beijing), 1948-1955.

《中山大學學報》(廣州)，1955。

*Zhong shan da xue xue bao* (Guangzhou), 1955.

《文史哲》(青島)，1952、1955。

*Wen shi zhe* (Qingdao), 1952, 1955.

《文學導報》(上海)，1931。

*Wen xue dao bao* (Shanghai), 1931.

《世界知識》(北京)，1951。

*Shi jie zhi shi* (Beijing), 1951.

《北斗》(上海)，1932。

*Bei dou* (Shanghai), 1932.

《北方文化》(張家口)，1946。

*Bei fang wen hua* (Zhangjiakou), 1946.

《生活星期刊》(上海)，1936。

*Sheng huo xing qi kan* (Shanghai), 1936.

《光明日報》(北京)，1954-1955。

*Guang ming ri bao* (Beijing), 1954-1955.

《光明報》(香港)，1948。

*Guang ming bao* (Hong Kong), 1948.

《考古通訊》(北京)，1955。

*Kao gu tong xun* (Beijing), 1955.

《自由叢刊》(香港)，1948。

*Zi you cong kan* (Hong Kong), 1948。

《東方雜誌》(上海)，1948。

*Dong fang za zhi* (Shanghai), 1948.

《科學通報》(北京)，1955。

- Ke xue tong bao* (Beijing), 1955.  
《哲學研究》(北京), 1955。
- Zhe xue yan jiu* (Beijing), 1955.  
《華商報》(香港), 1948。
- Hua shang bao* (Hong Kong), 1948.  
《新中華報》(延安), 1939。
- Xin zhong hua bao* (Yanan), 1939.  
《新世紀》(上海), 1936。
- Xin shi ji* (Shanghai), 1936.  
《新史學通訊》(開封), 1955。
- Xin shi xue tong xun* (Kaifeng), 1955.  
《新青年(季刊)》(廣州), 1924。
- Xin qing nian (ji kan)* (Guangzhou), 1924.  
《新青年》(北京), 1919。
- Xin qing nian* (Beijing), 1919.  
《新建設》(北京), 1954-1955。
- Xin jian she* (Beijing), 1954-1955.  
《新華日報》(延安, 南京), 1938-1939、1955。
- Xin hua ri bao* (Yanan, Nanjing), 1938-1939, 1955.  
《新學識》(上海), 1937。
- Xin xue shi* (Shanghai), 1937.  
《群眾》(香港), 1948-1949。
- Qun zhong* (Hong Kong), 1948-1949.  
《解放》(延安), 1939-1940。
- Jie fang* (Yanan), 1939-1940.  
《解放日報》(延安, 上海), 1942-1943、1955。
- Jie fang ri bao* (Yanan, Shanghai), 1942-1943, 1955.  
《認識月刊》(上海), 1937。
- Ren shi yue kan* (Shanghai), 1937.  
《學習》(北京), 1949、1951。
- Xue xi* (Beijing), 1949, 1951.  
《歷史研究》(北京), 1955。
- Li shi yan jiu* (Beijing), 1955.  
《嚮導》(上海), 1927。
- Xiang dao* (Shanghai), 1927.

《讀書生活》(上海), 1936。

*Du shu sheng huo* (Shanghai), 1936.

### (三) 專書及論文集

L. A. Schneider. *Ku Chieh-kang and China's New History*,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1; 中譯本: 梅寅生譯, 《顧頡剛與中國新史學》, 臺北: 華世出版社, 1984。

Zhong yi ben: Mei Yinsheng, yi. *Gujiegang yu zhong guo xin shi xue*, Taipei: Hua shi chu ban she, 1984.

向陽編著, 《華崗傳》,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3。

Xiang, Yang, bian zhe. *Huagang chuan*, Hangzhou: Zhejiang ren min chu ban she, 1993.

余英時, 〈未盡的才情——從《日記》看顧頡剛的內心世界〉, 收入《顧頡剛日記》第1卷, 臺北: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2007, 頁1-113。

Yu, Yingshi. "Wei jin de cai qing: cong 'Ri ji' kan Gujiegang de nei xin shi jie," *Gujiegang ri ji*, di 1 juan, Taipei: Lian jing chu ban shi ye gong si, 2007, 1-113.

吳康、周世輔, 《哲學概論》, 臺北: 正中書局, 1979。

Wu, Kang, Zhou Shifu. *Zhe xue gai lun*, Taipei: Zheng zhong shu ju, 1979.

李洪林, 《中國思想運動史》, 香港: 天地圖書有限公司, 1999。

Li, Honglin. *Zhong guo si xiang yun dong shi*, Hong Kong: Tian di tu shu you xian gong si, 1999.

胡明, 《胡適傳論》下卷, 北京: 人民文學出版社, 1996。

Hu, Ming. *Hushi zhuan lun*, xia juan, Beijing: Ren min wen xue chu ban she, 1996.

徐雁平, 《胡適與整理國故考論——以中國文學史研究為中心》,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3。

Xu, Yanping. *Hushi yu zheng li guo gu kao lun: yi zhong guo wen xue shi yan jiu wei zhong xin*, Hefei: Anhui jiao yu chu ban she, 2003.

高華, 《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的來龍去脈》, 香港: 中文大學出版社, 2000。

Gao, Hua. *Hong tai yang shi zen yang sheng qi de: Yanan zheng feng de lai long qu mai*, Hong Kong: Zhong wen da xue chu ban she, 2000.

張濟順, 《中國知識分子的美國觀(1943-1953)》, 上海: 復旦大學出版社, 1999。

Zhang, Jishun. *Zhong guo zhi shi fen zi de mei guo guan (1943-1953)*, Shanghai: Fu dan da xue chu ban she, 1999.

- 許志傑，《陸侃如與馮沅君》，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7。
- Xu, Zhijie. *Lukanru yu Feng Yuan Jun*, Jinan: Shandong hua bao chu ban she, 2007.
- 郭德宏、王海光、韓鋼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稿》，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
- Guo, Dehong, Wang Haiguang, Han Fang, zhu bian. *Zhong hua ren min gong he guo shi gao*, Chengdou: Sichuan ren min chu ban she, 2004.
- 陳永發，《延安的陰影》，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
- Chen, Yongfa. *Yanan de yin ying*, Taipei: Zhong yang yan jiu yuan jin dai shi yan jiu suo, 1990.
- 陳亞傑，《當代中國意識形態的起源：新啟蒙運動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北京：新星出版社，2009。
- Chen, Yajie. *Dang dai zhong guo yi shi xing tai de qi yuan: xin qi meng yun dong yu "ma ke si zhu yi zhong guo hua."* Beijing : Xin xing chu ban she, 2009.
- 彭明，《五四運動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 Peng, Ming. *Wu si yun dong shi*, Beijing: Ren min chu ban she, 1984.
- 舒衡哲(Vera Schwarcz)著，劉京建譯，丘為君校訂，《中國啟蒙運動——知識分子與「五四」遺產》，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
- Shuhengzhe (Vera Schwarcz), zhe, Liu Jingjian, yi, Qiu Wei jun, jiao ding. *Zhong guo qi meng yun dong: zhi shi fen zi yu "wu si" yi chan*, Beijing: Xin xing chu ban she, 2007.
- 費正清、羅德里克·麥克法誇爾(Roderick MacFarquhar)主編，王建朗等譯，陶文釗等校，《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1949-1965)》，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 Fei Zhengqing, Luodelike Maikefakuaer (Roderick MacFarquhar), zhu bian, Wang Jianlang, deng yi, Tao Wenzhao, deng jiao. *Jian qiao zhong hua ren min gong he guo (1949-1965)*, Shanghai: Shang hai ren min chu ban she, 1990.
- 羅爾綱著，《師門五年記·胡適瑣記(增補本)》，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
- Luo, Ergang, zhe. *Shi men wu nian ji, Hushi suo ji (zeng bu ben)*, Beijing: Sheng huo, du shu, xin zhi san lian shu dian, 2006.
- 顧潮，《歷劫終教志不恢——我的父親顧頤剛》，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
- Gu, Chao. *Li jie zhong jiao zhi bu hui: wo de fu qin Gujiegang*, Shanghai: Hua dong shi fan da xue chu ban she, 1997.

#### (四) 專文

尤小立，〈「公意」與五四前後《新青年》左翼同人的思想轉向〉，《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1期(南京，2010.01)，頁55-72。

You, Xiaoli. “‘Gong yi’ yu wu si qian hou ‘Xin qing nian’ zuo yi tong ren de si xiang zhuan xiang,” *Nanjing da xue xue bao (zhe xue, ren wen ke xue, she hui ke xue ban)*, 2010 nian di 1qi (Nanjing, 2010.01), 55-72.

尤小立，〈闡釋五四：陳獨秀與同代人的話語比較〉，《貴州社會科學》，2001年第1期(貴陽，2001.01)，頁99-104。

You, Xiaoli. “Chan shi wu si: Chenduxiu yu tong dai ren de hua yu bi jiao,” *Guizhou she hui ke xue*, 2001 nian di 1 qi (Guiyang, 2001.01), 99-104.

王若水，〈壓制思想的思想運動——讀李洪林的《中國思想運動史》〉，《當代中國研究》，第3期(紐澤西，2000.04)，電子資源：

<http://www.modernchinastudies.org/us/issues/past-issues/70-mcs-2000-issue-3/545-2012-01-03-12-11-40.html>

Wang, Ruoshui. “Ya zhi si xiang de si xiang yun dong: du Lihonglin de ‘Zhong guo si xiang yun dong shi,’” *Dang dai zhong guo yan jiu*, di 3 qi (New Jersey, 2000.04), dian zi zi yuan:

<http://www.modernchinastudies.org/us/issues/past-issues/70-mcs-2000-issue-3/545-2012-01-03-12-11-40.html>

安希孟，〈世界主義思潮：自西徂東〉，收入《哲學堂》2004年卷，太原：書海出版社，2004，頁212-229。

An, Ximeng. “Shi jie zhu yi si chao: zi xi cu dong,” shou ru, *Zhe xue tang*, 2004 nian juan, Taiyuan: Shu hai chu ban she, 2004, 212-229.

房德鄰，〈再評1930年代的新啟蒙運動〉，收入鄭大華、鄒小站主編，《中國近代史上的激進與保守》，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頁380-395。

Fang, Delin. “Zai ping 1930 nian dai de xin qi meng yun dong,” shou ru, Zheng Dahua, Zou Xiaozhan, zhu bian, *Zhong guo jin dai shi shang de ji jin yu bao shou*, Beijing: She hui ke xue wen xian chu ban she, 2011, 380-395.

桑兵，〈世界主義與民族主義——孫中山對新文化派的回應〉，《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2期(北京，2003.03)，頁77-99。

Sang, Bing. “Shi jie zhu yi yu min zu zhu yi: Sunzhongshan dui xin wen hua pai de hui ying,” *Jin dai shi yan jiu*, 2003 nian di 2 qi (Beijing, 2003.03), 77-99.

柴宇平，〈「世界國家觀」考評〉，《福建論壇》，1999年第1期(福州，1999.01)，頁72-77。

- Chai, Yuping. “‘Shi jie guo jia guan’ kao ping,” *Fu jian lun tan*, 1999 nian di 1 qi (Fuzhou, 1999.01), 72-77.
- 張豔，〈對五四時期「問題與主義」之爭歷史闡釋的學術解讀〉，《中共黨史研究》，2010年第5期(北京，2010.10)，頁54-63。
- Zhang, Yan. “Dui wu si shi qi ‘wen ti yu zhu yi’ zhi zheng li shi chan shi de xue shu jie du,” *Zhong gong dang shi yan jiu*, 2010 nian di 5 qi (Beijing, 2010.10), 54-63.
- 馮崇義，〈論30年代夭折的「新啟蒙運動」〉，《開放時代》，1999年第3期(廣州，1999.05)，頁57-63。
- Feng, Chongyi. “Lun 30 nian dai yao zhe de ‘xin qi meng yun dong,’” *Kai fang shi dai*, 1999 nian di 3 qi (Guangzhou, 1999.05), 57-63.
- 趙儷生，〈胡適歷史考證方法的分析〉，《學術月刊》，1979年第11期(上海，1979.11)，頁42-46。
- Zhao, Lisheng. “Hushi li shi kao zheng fang fa de fen xi,” *Xue shu yue kan*, 1979 nian di 11 qi (Shanghai, 1979.11), 42-46.
- 歐陽軍喜，〈論新啟蒙運動〉，《安徽史學》，2007年第3期(合肥，2007.05)，頁57-59。
- Ouyang, Junxi. “Lun xin qi meng yun dong,” *An hui shi xue*, 2007 nian di 3 qi (Hefei, 2007.05), 57-59.
- 蔡樂蘇，〈《毛澤東早期文稿》中幾個關鍵詞語釋義〉，《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3年第6期(北京，1993.11)，頁34-43。
- Cai, Lesu. “‘Maozedong zao qi wen gao’ zhong ji ge guan jian ci yu shi yi,” *Beijing da xue xue bao (zhe xue she hui ke xue ban)*, 1993 nian di 6 qi (Beijing, 1993.11), 34-43.
- 謝泳，〈胡適思想批判與《胡適思想批判參考資料》〉，《開放時代》，2006年第6期(廣州，2006.11)，頁44-54。
- Xie, Yong. “Hushi si xiang pi pan yu ‘Hushi si xiang pi pan can kao zi liao,’” *Kai fang shi dai*, 2006 nian di 6 qi (Guangzhou, 2006.11), 44-54.
- 羅志田(署名羅厚立)，〈歷史記憶中抹去的五四新文化研究〉，《讀書》，1999年第5期(北京，1999.05)，頁37-45。
- Luo, Zhitian (shu ming, Luo Houli). *Li shi ji yi zhong mo qu de wu si xin wen hua yan jiu*, *Du shu*, 1999 nian di 5 qi (Beijing, 1999.05), 37-45.
- 羅志田，〈從科學與人生觀之爭看後五四時期對五四基本理念的反思〉，《歷史研究》，1999年第3期(北京，1999.05)，頁5-23。
- Luo, Zhitian. “Cong ke xue yu ren sheng guan zhi zheng kan hou wu si shi qi dui

wu si ji ben li nian de fan si,” *Li shi yan jiu*, 1999 nian di 3 qi (Beijing, 1999.05), 5-23.

羅志田，〈歷史創造者對歷史的再創造：修改「五四」記憶的一種嘗試〉，《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0年第5期(成都，2000.09)，頁92-101。

Luo, Zhitian. “Li shi chuang zao zhe dui li shi de zai chuang zao: xiu gai ‘wu si’ ji yi de yi zhong chang shi,” *Sichuan da xue xue bao (zhe xue she hui ke xue ban)*, 2000 nian di 5 qi (Chengdou, 2000.09), 92-101.

**Writing and Shap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Political Discourse  
and Political Image of “May Fourth” in Chinese Mainland  
after 1949 - A Discussion Centered on the Anti-Hu Shi  
Campaign**

You, Xiao-li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Soochow University

Although the political discourse and political image of “May Fourth” were accepted gradually by people in the Chinese Mainland after 1949, its origin can be traced back to the interpretation and positioning of left-wing intellectuals after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of 1919. In the late 1930s and the beginning 1940s, Mao Zedong had regarded “May Fourth” as the “beginning of a new democratic revolution,” and consequently the political trend of “May Fourth” began to form. As the “May Fourth Incident” rose in prominence, it became one of the ideological foundations of historical legitimacy of the CCP. Simultaneously,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gradually vanished, and was eventually assimilated into the “May Fourth Incident.” Since 1949, the constant political movements and ideological remolding movements of positive and negative strengthening propaganda, especially the Anti-Hu Shi Campaign, not only ruled out Hu Shi as the leader of the “May Fourth,” acting with Li Dazhao, Mao Zedong and Lu Xun, but also dispelled all essential elements of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such as science, democracy, individualism, pragmatism and cosmopolitanism and so on. So far, “May Fourth” has been a thoroughly political conceptualization and ideologization, and its influence has been continuing to this day.

**Keywords: May Fourth Movement, New Democratic Revolution, Hu Shi,**



**Mao Zedong, Individualism, Cosmopolitanism**

